

分类号：F323.6
论文编号：2017020648

密 级：公开

贵州大学
202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 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学科专业：农林经济管理

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导 师：罗蓉教授

研 究 生：韩琳子

中国 ▪ 贵州 ▪ 贵阳
2020年5月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2
1.2.1 研究目的	2
1.2.2 理论意义	2
1.2.3 现实意义	2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1.3.1 国外研究现状	3
1.3.2 国内研究现状	4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6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7
1.4.1 研究内容	7
1.4.2 研究方法	7
1.5 研究创新	8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9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9
2.1.1 易地扶贫搬迁	9
2.1.2 生计转型	9
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10
2.3 分析框架	10
2.3.1 可持续生计理论基本框架	10
2.3.2 生计转型分析框架	11
3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现状分析	14
3.1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概况	14
3.1.1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14

3.1.2 贵州省搬迁现状	15
3.2 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概况	15
3.2.1 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15
3.2.2 调研安置点现状	19
4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转型调查	20
4.1 调查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20
4.1.1 调查问卷的设计	20
4.1.2 调查的范围	20
4.1.3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0
4.2 农户生计方式的变化	21
4.3 农户生计资本定量分析	23
4.3.1 生计资本评价体系	23
4.3.2 权重及综合资本指数的确定	24
4.3.3 生计资本结果分析	25
4.3.4 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26
4.4 农户生计结果的变化	32
4.5 小结	33
5 基于 Logistic 模型对移民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34
5.1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34
5.1.1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34
5.1.2 变量定义	35
5.2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与分析	36
5.3 基于实际调研的搬迁农户生计转型评价	39
5.3.1 技能培训促进生计转型	40
5.3.2 农业发展促进生计转型	40
5.3.3 金融扶贫促进生计转型	41
5.3.4 城市融合促进生计转型	41
5.4 小结	42
6 促进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对策建议	43

6.1 加强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创业	43
6.2 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产业升级	43
6.3 建立金融服务机制，拓宽增收渠道	44
6.4 加大帮扶力度，确保项目落地	44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46
7.1 结论	46
7.2 研究展望	46
致谢	48
参考文献	49
附录 1:	54
附录 2:	55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影

响因素研究

中文摘要

在实现精准脱贫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是一条有效途径，不仅可以改变居住条件，还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能做到实施一个搬迁项目、安置好一方群众、实现一方人脱贫的理想目标。在这一政策中，搬迁只是实现路径，而脱贫才是最终目标。目前贵州省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进入新的阶段，工作重心从之前解决好“如何搬”、“怎么搬”向“搬后怎么办”转变，从以搬迁为主向后续扶持和社区管理转变，从“搬得出”向“搬得住、能致富”转变，借助于强有力的后续政策措施来提升搬迁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得他们能更快更好地融入安置点生产生活，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为此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已有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转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接着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相关内容设计调查问卷并选取贵州省 4 个典型安置点进行实地入户访谈，针对贵州省 2016 年以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在分析了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基础之上，结合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生活现状，建立了贵州省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其次基于该分析框架对农户的生计转型情况就行研究，研究得出，在 387 份研究对象中有 321 户实现了生计转型。并通过构建搬迁农户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对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量化以及对比分析，探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差异性的原因；最后在二元 Logistic 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农户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研究得出家庭劳动力数量、技能培训次数、家庭年收入、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以及政府帮扶是否增加为显著影响因素，并针对该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生计方式，生计转型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Abstract

Precision of poverty in the process, the change of relo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not only can change the living conditions, can als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an implement a relocation project place one party people achieve ideal target the people out of poverty in the policy, move just paths, but poverty is the ultimate goal. Currently move chan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guizhou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the work center of gravity from the solution of how to move before how do change after starting to move, give priority to in order to move from to subsequent support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from move to move to live can get rich, with the aid of a powerful follow-up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moving th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masses, so they can better and faster into the site production and living, as soon as possible out of poverty to get rich.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roug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ading and comb, the livelihood of the chan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hen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eory designed questionnaire and field household interview four typical sites in guizhou, in guizhou province since 2016, studies the chan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This paper adopt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 First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of the British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bining with the living status of the relocated people in transboundary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sis frame for the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of relocated farmers in guizhou province. Second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will do research and study, in 387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ransform the livelihoods of 321 by building relocation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the livelihood of the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ove capital a quantitativ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livelihood capital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binary Logistic model,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the number of skill training times, the household annual income and the annual income related to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as well as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were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is conclusion.

Key words: Relocation;Livelihood capital;Livelihood way;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变得愈加棘手，发展本就落后的贵州省农村地区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1986 年，贵州省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开发。近些年来，随着扶贫工作的稳步推进，该省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有了明显减少，扶贫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如何加快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步伐，保障贫困人口的后续发展成为了贵州省政府和全体人民亟待解决的问题。贵州省处于西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结构单一、交通不畅、多民族聚居，诸多现实问题使得扶贫工作难以继续开展，农村贫困地区更是出现“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现状。因此，贵州省试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为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群众的脱贫和后续发展问题。

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我国从 2000 年起大规模开展实施的工程。2011 年国家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在专项扶贫中提出易地扶贫搬迁要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随着中央扶贫工作大会的召开与《全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等系列纲领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有关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完善与深化。关于扶贫如何扶的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在 2016 年特别指出，为了让贫困人口真正得到帮助，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计划并且实施“五个一批”的脱贫攻坚计划，大力实施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政策，提高脱贫项目资金的精准度。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中的重点工程，是“五个一批”的内容之一，它是我国为了解决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研究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对于贫困户彻底脱贫，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项目“五个一批”中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点炮”。搬迁后农户的生计转型成功，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才是政策的初衷。贵州省是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这些搬迁人口中大部分是贫困农户，相对于搬迁工作来讲，搬迁之后的这些贫困农户的生计状况如何，是否转型成功，能否实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还面临哪些问题，需要通过实地入户访谈进行跟踪监测研究。本文将围绕生计理论，以贵州省已搬迁农户为样本，开展大规模入户调研，研究贫困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生计方式和生计结果的变化，全面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后的生计转型情况。根据调研结果，总结成功经验和存在的生计障碍，提出政策建议。

1.2.2 理论意义

生计问题是民之根本、国之大计。现今，我国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成果颇多，本文综合前人对于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经验和成果，总结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内涵，利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构建一个符合实际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分析框架。本文将以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是否成功，是否实现了生计可持续为出发点，建立一个基于整合生计理论的评价搬迁政策的分析框架和评判标准。这些研究成果将进一步丰富可持续生计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2.3 现实意义

贵州省区域性贫困问题突出，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贫困与长期发展等问题的关键之策，同时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计问题是关系到移民在安置点能否长期维持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户生计转型问题，直接关系到安置点移民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去、留得下来、可以就业、拥有保障。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既能够总结成功经验，便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加快其他类似地区的精准脱贫工作推进；也能够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能够结合实际提出改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政策建议，对于调整相关政策确保有效推进具有决策咨询的作用。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1) 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精准脱贫政策。国外与之相对应的，主要是环境难民、生态移民等概念。最初阐明“环境难民”这一定义的是埃及的学者 El-Hinnawi^[55]。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移民、环境移民等词语逐渐替代环境难民。Bates (2002) 认为主要有灾害型、土地征用型、环境退化型这三类环境难民^[53]。随着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重点已经由概念的界定、分类等转向到搬迁原因、移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搬迁的绩效评价等多方面。1997 年，Doos 认为导致移民的重要原因是环境的变化^[42]。Sabine Henry (2004) 等认为人口迁移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气候的变化^[58]。Alisson F. Barbieri (2010) 等提出气候变化成为一个人口迁移推动因素^[51]。David J. Wrathall (2016) 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促进迁移的非理性因素^[44]。关于搬迁的效益评价，Westma 首次分析评估了“自然的服务”，并将这一概念纳入了效益评价的体系中去^[50]。

(2) 有关生计理论的研究

随着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国外对生计问题有了逐步的认识。Ellis (2000) 将生计定义为居民获得收入的方式和活动^[38]。国际上比较认同的生计概念：“生计是寻求生产的方式，谋生方式建立在活动 (activities)、资产 (assets)、能力 (capabilities) 的基础上”。AmartyaSen 等 (2000) 研究认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而解决贫困的重要方法是维持可持续生计^[39]。Koczberski 和 Curry 研究了移民的生计策略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动态影响^[45]。Glavovic 和 Boonzaie 在分析失地移民的生计策略问题中用可持续生计概念^[52]。BrianKing (2011) 探究生计的关系与空间转移之间的相互影响^[43]。Quisumbinga 对人口迁移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进行了对比^[40]。Maretzki 着重对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一种关于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适用路径^[41]。Wallace 认为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在于教育培训^[47]。Goulden 等基于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之上，探析环境的变化对生计及其策略的影响^[48]。随着对贫困问题的不断研究，大量的专家学者开始了可持续生计问题的框架研究。可持续分析框架 (SLA 框架) 在众多的分析框架中最具代表性，且被广大学者大量运用。Hesselberg (2006) 等利用 SLA 框架

分析了脆弱性贫困群体和生计安全^[46]。Peter Jacobs (2012) 基于 SLA 框架分析了土地和社会补助对贫困农户的影响，强调了土地政策的重要性^[49]。

1.3.2 国内研究现状

(1) 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

1993 年国内首次提出生态移民一词，随后国内学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相对于国外，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丰富，从概念和分类，生态移民的方式，生态移民的相关效益评价等多方面对生态移民展开了研究。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在近几年。2014 年及以前每年仅有 30 余篇文献，文献数量直到 2016 年才有了较快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理论解释、政策分析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但围绕易地扶贫搬迁的案例和经验总结开展研究的不多，主要关注于三江源地区的云南、青海，宁夏等地，近年来学者也关注到了山西、湖北、贵州等省。

目前，关于多数易地扶贫搬迁的理论解释依托于减贫研究的相关理论，重点在分析贫困户搬迁的原因、如何搬迁以及贫困户搬迁后的社会融入等问题。葛根高娃和乌云巴图 (2003) 引入扶贫的概念，认为移民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理论概念^[34]。孙永珍等 (2013) 指出可持续发展、生态贫困、社会适应等理论研究支撑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相关理论机理^[10]。王晓毅 (2016) 认为扶贫搬迁是一种自愿移民，是帮助农户脱贫的有效手段^[3]。陈胜东 (2016) 认为搬迁的主要原因在于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等^[16]。李娜 (2010) 从社会融入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搬迁后移民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17]。关于政策分分析，叶青、苏海 (2016) 认为政策设计的偏差是存在的主要问题，应当提高瞄准度^[8]。曾小溪,汪三贵 (2017) 强调搬迁后的后续扶持政策需求强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因地制宜并符合移民的生计能力^[35]。吴新叶、牛晨光 (2018) 利用“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指出政策的制定要满足移民的正常诉求，及时变革，同时移民也应当接受政策的制约，尽快适应现代化生活^[21]。关于对策建议，王红彦 (2014) 分析了印度、泰国等 5 国的移民进程，进一步提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健全产业扶持体系、充分发挥信贷作用等建议^[4]。王金涛、陈琪 (2016) 认为影响易地搬迁绩效的重要因素是动员力度和心理聚合^[5]。李宇军、张继焦 (2017) 指出要提高搬迁效果就必须要提升移民的主体能动性，在搬迁工作中激发移民的内生动力^[18]。高强 (2019) 搬迁的后续发展问题需要重视，统筹帮扶措施、促进社会融入、

深化农村改革，做好搬迁的后续工作^[31]。

（2）有关可持续生计的研究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首先研究的是脆弱性背景。由于研究背景和对象不同，学者们对脆弱性内涵的阐释尚未形成共识，但普遍认为其与危险、受灾度、贫困恢复力和可行能力等概念有紧密的联系。国内关于脆弱性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从移民自身的角度评估脆弱性。李小云等（2007）认为导致农户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计资本的缺乏^[19]。韩文文等（2016）基于集对分析和障碍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生计方式单一和生计结构不合理对生计脆弱性的累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6]。刘伟等（2018）利用陕西安康市三县的调查数据对农户生计现状进行了分析^[12]。梁爽等（2019）以西北地区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指出生计脆弱性主要受非农就业比重和人均收入的影响^[33]。其次是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研究生计资本状况、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关系以及国家政策对其的影响等方面。李婵（2019）从精准扶贫的视角出发，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优化农户生计资本^[37]。许汉石等（2012）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生计策略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影响关系^[11]。夏紫顿（2019）基于陕北燕沟流域 14 个村的基础数据，对退耕还林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退耕还林的实施使得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增加，其他资本减少^[32]。最后是对生计策略进行的研究，安士伟（2018）认为生计策略地区性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形、通达度以及区位等因素^[15]。孔令英等（2019）认为决定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是自然资本，而人力、物质、金融以及社会资本则促使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纯农型转换^[7]。

大量的专家学者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严登才（2013）认为库区移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移民素质低、失去土地和补偿性机制的缺陷等，提出完善补偿性机制、开发水面资源、加强技能培训等建议^[22]。何力（2015）着重分析了影响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的影响因素，总结出失地农民生计资本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23]。冯伟林、李树苗（2016）指出政府针对搬迁后贫困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出现的失灵现象，应努力提升安置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引导移民参与专业化的合作组织，给予移民和当地农户平等的待遇^[9]。刘宗华（2019）指出影响移民生计可持续的主要因素是生计资本脆弱性^[13]。国内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

应用也很广泛。苏冰涛等(2014)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分析了“生态贫民”的生计范式,结果表明可持续生计能力与生计范式线性相关^[24]。李树苗等(2017)运用框架分析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探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20]。王静(2018)从生计资产量化的角度切入,运用DFID框架研究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6]。刘文佳等(2019)借助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在“公司+农户”模式下进行生产活动后农户的生计水平变化进行研究^[14]。

(3) 有关生计转型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户的生计转型问题主要集中于生计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生计转型结果的研究以及生计转型对策建议的研究。有关生计转型驱动因素,部分学者从环境背景、生计资本以及政策与制度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张芳芳等(2015)认为农户生计选择依赖于环境背景,自然环境的改变是脆弱性背景下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原因^[25]。张银银等(2017)认为促使农户生计方式从农业向非农业转换的驱动因素为人力资本^[26]。赵雪雁等(2013)指出退牧还草工程实施后,农户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多样性改变,非农化程度明显提高^[28]。有关生计转型结果,周建新等(2013)以西双版纳哈尼族为研究对象,指出在自然环境以及国家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农户的生计方式正在由传统的刀耕火种向橡胶种植业转变^[27]。赵立娟等(2017)认为土地流转后,生计策略多样化,拥有较高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农户大多选择混合型和务工型生计策略^[29]。有关生计转型对策建议,黄载德(2016)认为城中村村民的生计转型需要社会、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2]。王博(2016)认为在诺邓村村民生计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和村民的努力为主要动力,但地方性文化无人继承是生计转型的潜在阻力,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赵旭等(2018)针对南水北调工程移民生计转型问题分析后提出激活土地市场、多方面拓展就业渠道、提升移民工作技能等建议^[30]。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从以上查阅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计问题研究正在逐渐深入,这与我国近几年大力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相呼应。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标量化以及生计可持续遭遇外部冲击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和观点对本文研究贵州省生计转型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和启发价值。但缺乏从生计资本如何通过生计方式来影响生计转

型是否成功的内在机理研究，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农户的生计方式、生计结果有何影响的研究不足。因此本文以生计资本与生计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出发点，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补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并将数据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五大资本类型。同时依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建立了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通过探究生计资本如何通过生计方式来影响生计转型是否成功的内在机理，找出影响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因素。

1.4.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基于某一特定的研究方向，通过收集、整理文献，思考现有研究成果进而全面了解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对已有的大量文献进行阅读和梳理，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转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本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

本文将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设计一套较科学的调查提纲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包括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搬迁前后收入和支出等常规的调查结果，还要包括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状况、选择的生计方式，以及对目前实施的各种搬迁政策和满意度的调查。选取思南县、幺铺镇和大塘镇三个地方展开实地调研，调研中问卷一共发放 385 份，去除无效问卷共收回 378 份。

（3）统计分析法

基于调研获得的基础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了解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生计方式以及生计结果的变化，对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客观和科学。

1.5 研究创新

本文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结合贵州省贫困农户搬迁前后的实际情况，详细阐述生计资本通过生计方式对农户生计结果的作用机理，分析外部冲击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影响，研究搬迁政策帮助贫困农户抵御外部冲击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资本如何改善生计收入的作用机理，从而构建起一个适合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基于整合生计理论的分析框架，这是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理论创新。通过对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农户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并且应用所建立的基于整合生计理论的分析框架开展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找出影响搬迁贫困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提出关于搬迁安置、搬迁后农户就业等政策建议。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易地扶贫搬迁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政策，坚持“群众自愿，政府引导”的原则。易地扶贫搬迁是移民在政府的引导下，从生活条件恶劣的地区搬迁安置到生活条件较好，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为帮助移民脱贫致富，在搬迁后对移民进行技术培训和产业扶持，拓宽移民的增收渠道，增加移民的经济收入。具体来说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其中集中搬迁安置体现的尤为明显。易地扶贫搬迁需要照顾到安置地居民，搬迁移民等多种多样的利益相关者，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易地扶贫搬迁需要对安置地进行开发，对移民进行搬迁并且安置的过程。易地扶贫搬迁依赖于移民，政府以及搬迁安置地三者的协同作用，只有三者共同发挥作用，易地扶贫搬迁才能够顺利进行，实现移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易地扶贫搬迁是指 2016-2020 年贵州省实施的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2.1.2 生计转型

生计方式是建立在自身拥有的资本、能力以及活动而选择的一种谋生手段。农户根据自身所拥有的生计资本选择合适的生计方式，如果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质量越高、品种越多，则可以选择的生计方式就越广泛，相应的就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抵御各种内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其实人们用于谋生的生计方式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的来说就是自身需求、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会促使人们对原有的生计方式进行调整，形成新的生计方式，这一过程就是生计转型。微观层面是指农户的职业发生了改变，而宏观层面更倾向于农户的生计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是指搬迁农户在搬离原来赖以生存的住所后，在生存环境、生计资本等资源发生重大改变后，对原有的生计方式进行改变和调整形成新的生计方式。其结果是搬迁农户大多由纯农户转变为兼农户或者非农户，对土地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的依赖度越来越弱。

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第一次提到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1995 年《哥本哈根宣言》指出：稳定的生计才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之道并强调了发展计划和减贫政策也是重要的环节。1998 年斯库恩斯 (Scoones) 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某一项生计活动能够应对较大的冲击和压力并得以恢复，但是恢复的过程中不能够过度的消耗自然资源且能够维持或改善其资本和能力，则该生计活动具有可持续性。目前普遍认可的可持续生计的定义为：个人或者家庭在脆弱性背景下，面对自然资源、社会环境以及经济条件等各种外部风险，仍能够长期维持或改善其利用各种资本的能力，抵御风险所带来的危害，使得自身生计的生计的活动得以长期改善。

2000 年，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对可持续生计的概念进行扩充并建立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同年美国援外合作组织（CARE）提出农户生计安全框架。随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 2001 年提出了可持续生计途径。但目前学术界应用最广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本文中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主要是指农户在搬迁到安置点后，面对各种脱贫政策优化后的生计资本，合理选择新的生计方式，逐渐实现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并且转型后的生计收入能够维持必要的生计支出由此可持续循环下去。

2.3 分析框架

2.3.1 可持续生计理论基本框架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如图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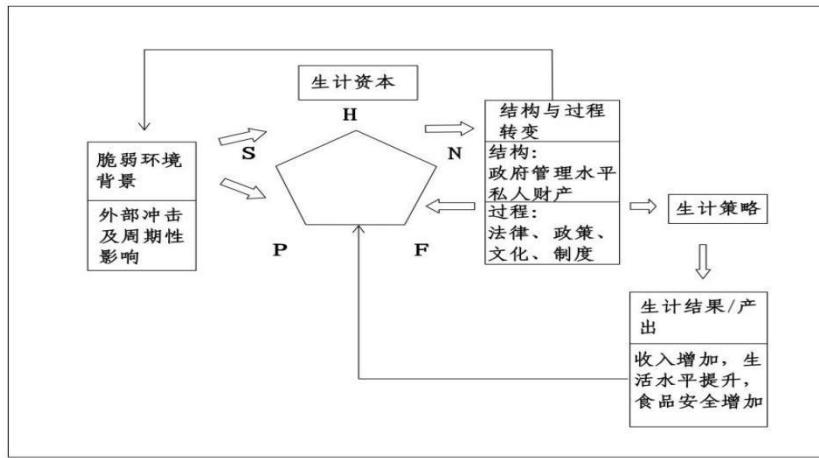


图 2-1 英国国际发展署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该分析框架由五部分构成,分别是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过程转换、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该框架以人为主线,当农户处于脆弱性背景,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合理调配拥有的生计资本,选择合适的生计策略,便可以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合理优化生计资源、增强食品安全、降低农户脆弱性。当农户的生计结果发生改变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由此进入无限循环的过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代表了农户未来的生存能力。人力资本狭义的可以理解为劳动力资本,将劳动力通过生产活动转化为劳动报酬输出;自然资本强调自身拥有或者可以配置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旱地、山林、水田等;物质资本是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基础,对于贫困农户来说物质资本尤为重要,主要包括房屋、交通以及生产工具等;金融资本大多以资金或潜在的资金支持的形式存在,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政府金融政策等;社会资本是指农户拥有并能利用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亲戚、朋友、社会帮扶关系等。

2.3.2 生计转型分析框架

本文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计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对框架做出改变,建立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以适应本文的研究。

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贫困农户往往会遭遇一些外部冲击,其中主要包括:①天灾人祸:地震、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火灾、重大疾病等偶然因素。②市场风险: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市场经营不善等

影响因素。外部性冲击会促使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发生改变，例如：农户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会受到地质灾害的影响；意外火灾将直接损毁农户的房屋，减少物质资本；农户的人力资本可能因为重大疾病而减少；农户的物质资本可能因为生产资料的上涨而减少；农户的金融资本可能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而减少；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会降低收入影响农户金融资本的形成。上述分析说明，搬迁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因此抵御外部冲击对搬迁农户来说非常重要。

在整个脱贫攻坚过程中，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脱贫政策和措施，当前大规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更是出台了很多配套的脱贫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给搬迁农户的住房、门面等；特惠贷、土地流转等具体的金融脱贫政策；教育脱贫政策、就业脱贫政策、医疗救助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帮扶等。一方面，实施脱贫政策可以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危害，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而农户的生计资本又通过生计方式进一步改善生计收入。具体来说，搬迁政策提供住房、门面等对农户的物质资本有很大的改善作用；就业培训、教育扶持等对农户的人力资本有很大的改善作用；土地流转等对农户的金融资本有很大的改善作用；社会扶持、结对帮扶等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有很大的改善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政策的制定会根据农户生计资本的实际情况制定，同时脱贫政策的有效性也需要农户生计资本状况的改善得以反应。因此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关键要素。

就搬迁农户来讲不同的生计方式就是把不同的生计资本进行整合，即生计资本的质量和总量决定了可以选择的生计方式。从调研的结果看，搬迁农户的各种生计资本通过生计方式行成生计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自然资本

多数农户的自然资本是旱地、水田、山林等，农户可以通过自然资源进行传统的种养殖带来经营性收入，也可以将土地进行流转带来资产性收入。

（2）物质资本

农户的物质资本最重要的是房屋，可以通过出租带来资产性收入，也可以自主经营带来经营性收入，同时房屋的拆除复垦后也能转化为资产性收入。

（3）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主要是将拥有的资金或者通过特惠贷等项目获得的资金与经营活

动相结合，带来经营性收入，再者将资金进行投资获得，带来投资性收入。

(4)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农户在婚丧嫁娶、修房建屋中获得的人情往来实现人情收入，也包括结对帮扶、企业帮扶、社会帮扶等带来的社会各界的捐赠、国家政策补助等各种收入。

(5)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五种生计资本中最能转化为收入的资本，可以通过就业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务收入，也能通过第一产业的种养殖获得种养殖收入，结合第二产业开展创业活动获得收入，参与第三产业的经营获得经营性收入。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建立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分析框架，如图 2-2 所示：在各种外部冲击和脱贫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生计资本在不同生计方式的作用下产生不同的生计收入。生计方式的选择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生活水平、人均收入，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进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本文将生计方式的转变定义为生计转型，如果搬迁后农户的生计资本能够通过生计转型持续稳定形成生计收入，生计收入又反过来增加农户的生计资本，那么该农户的生计就可以持续良性循环下去，实现生计的转型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家庭将不断增加收入从而脱贫致富，反之不能实现生计的转型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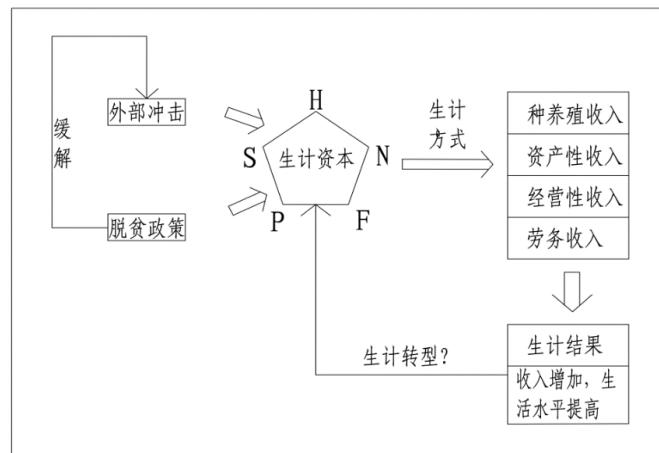


图 2-2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

3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现状分析

3.1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概况

3.1.1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贵州省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阶段（2001-2011 年）没有出台新的政策，执行的是国家发改委的政策。在 2012-2015 年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建设中，省政府每年印发全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方案，以此指导全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建设。在 2016-2020 年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中，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意见》(黔府发〔2016〕22 号)、《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精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若干政策意见》(黔党发〔2017〕6 号)，省发改委、扶贫办、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联合印发了《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黔发地区〔2016〕2037 号)。

在这场浩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贵州省以“六个坚持”、“五个体系”贯穿始终，根据省内实际情况开辟出一条易地扶贫搬迁的新路。以“六个坚持”做好搬迁过程中的前一半工作，坚持省级统贷统还，设立专门的省扶贫开发投资公司；坚持以贫困村寨的整体搬迁为主，按照 11 项详尽的登记流程，精准确定搬迁群众，并以 50 户以下，贫困发生率 50%以上的自然村寨为重点；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考虑到贵州省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所以坚持以城市和县城为主进行集中安置，增加搬迁后的创业就业机会；坚持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由于过去许多乡镇工程造成了点多面广，工作经验不足以及资源配置不足等问题，因此规定所有项目均由县级政府负责实施；坚持贫困户不因搬迁而负债，且实施住房补助差别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 2 万元，同步搬迁人口人均 1.2 万元。并且按期拆除旧房的人均奖励 1.5 万元；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的原则，为了落实“一人以上就业”的目标，建立培训机制、企业引进机制以及产业配套机制。以“五个体系”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部分工作，解决搬出后怎么办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整合财政资金，重点关注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截止 2019 年 4 月已经配套学校 36 所，县级医院或基层医疗服务机构 235 所；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各方面资源，加强搬迁户技能培训，实现生计方式非农化。2016

年搬迁后能实现一人以上就业的家庭占年度搬迁的 98.99%，2017 年占比为 98.41%；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增强农户搬迁后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应多多举办心怀感恩、文化传承等喜闻乐见的活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根据安置点规模和区域实际，合理设置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管理服务单元，强化社会事务、治安管理等职能¹。

3.1.2 贵州省搬迁现状

早在 2015 年贵州省就启动易地扶贫搬迁，计划搬迁贫困人口占贵州省贫困人口三分之一、占中国搬迁贫困人口六分之一，是中国搬迁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省份，也是全国唯一全部实行城镇化集中安置的省，事关全省乃至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局。2016 年贵州省投入 270 亿资金计划分两批进行 45 万贫困人口的搬迁，30 万人口、7.14 万配套住房为第一批次；15 万人口，2.6 万配套住房为第二批次。各级政府组织搬迁农户相关技能培训高达 3.9 万余次，帮助 3.6 万余人在当地就近就业。2017 贵州省计划搬迁 76.2 万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 68.6 万余人。2018 年贵州省计划搬迁 67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 45.1 万人。截至 2019 年底，全面完成了 188 万人搬迁入住任务。在“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制定了 188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的目标，占我国易地搬迁的 15%，在这里面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50 万人；到二零一九年一月贵州省累计搬迁人口占“十三五”时期搬迁数的 70.21%，累计 132 万余人²。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以来，贵州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以“六个坚持”、“五个三”为基本遵循统筹推进，截止 2019 年底，已完成 188 万人搬迁入住任务，工程建设和搬迁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3.2 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概况

3.2.1 调研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本次研究选取贵州 2 个县的 4 个移民安置点进行实地调研，分别为大龙开发区的龙江新区、大德新区、德龙新区，以及三穗县彩虹社区，具体情况如下：

调研区 1：大龙经济开发区

大龙经济开发区按照省委、省政府“1+7”总体部署和“五个体系”建设要

¹ 数据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贵州省扎实推进扶贫搬迁“五个体系”》

² 资料来源：多彩贵州网，<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A6C3HKI053469QL.html>

求，围绕“搬得出、稳定住、能致富”工作目标制定实施方案，深化“五个体系建设”，稳步实现“安得下来、融的进去、和谐发展”目标。

(1) 突出“三建”，基层党建体系建设。一是突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在每个安置点设立2个党总支和8个党支部。组织机关、街道、搬入地原村居的支部与安置点支部开展联建活动。二是突出社区群众服务队伍建设。成立社区群众自治组织，设8个社区居委会，选好居委会成员，设立居民楼“楼长”，做好“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工作。“一区两县”70余名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由县级领导任组长，实现迁入地和迁出地联动服务。三是突出群团组织队伍建设。组建基层工会、团支部、妇联等群团组织，组织开展工会“手拉手”、团建“一籍双支”、妇联“1+1”等帮扶联谊活动。

(2) 落实“三业”就业服务体系。一是多措并举增就业。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依托园区企业优势发展配套产业，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在安置点的就业难题。大力培育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全产业链，二是搭建平台帮创业。落实“雁归工程”、小额创业贷款、精准扶贫贷款等就业创业政策。结合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土地、弃土场等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推广“农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搬迁户”模式，建立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3) 建好“三家”社区治理体系。一是强化配套幸福安家。在全省率先完成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撤镇设街道工作，撤销原大龙镇，设立大龙、麻音塘街道。成立3个社区居委会，设立便民服务大厅，优化整合户籍管理、就业、就医、就学、社保、水电费交纳、水电维修等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便捷服务温暖小家。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社区”平台系统，建设大数据智能化社区。在安置区完善“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投入资金1288万元，计划3年建成智能平安小区。三是多元化治理和谐大家。结合“警民共建、警民互动、警民互助”的方式。发动企业、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等多方力量参与，组建群众自治组织，完善安置点及周边地区的治安防控网，组建6个巡逻队伍，对安置区实行24小时巡逻。

(4) 强化“三保障”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强化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在安置点规划建设为民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优化整合户籍管理、就学、就业、就医、社保、水电费交纳、水电维修等窗口等便民服务窗口。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资

源保障。设立 2 个卫生服务中心及医疗诊所，方便搬迁群众就医问诊，完善医疗救助政策。坚持教育资源“缺多少补多少”，规划建设中小学、幼儿园 7 所，方便随迁群众子女就近入学。加快搬迁户籍迁移办理进度，目前累计办理落户 2670 户 12484 人。三是强化公共服务力量保障。公共服务力量下沉，形成“一区两县” 70 余名干部、20 名社区干部、146 名教师（含支教、志愿者教师），17 名医务人员、80 余名志愿者等多方位公共服务群体。

（5）开展“三活动”文化服务体系。一是持续开展感恩教育活动。通过对新旧住房照片、今昔变化，教育引导群众感恩总书记和党中央。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夜校、周末课堂等活动，宣讲党的政策。二是举办社区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建立老年活动中心、图书室、微型文化广场、综合性文体广场，多功能健身场地，扎实开展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三是深入开展文化融合活动。开设乡愁馆，组织社区活动等，共同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

调研区 2：三穗县

（1）突出工作目标，确保责任落实。一是健全指挥体系。成立专班，分综合组、规划建设组、资金工作组等 5 个小组负责日常事务。明确县委书记、县长为双指挥长，包保辖区内的所有安置点，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二是明确工作职责。县政府与各乡镇相关部门分别签订了工程建设、后续发展服务等 7 项工作责任状。三是落实问责机制。出台《三穗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责任管理办法》，对不及时完成任务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工作推进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追责问责，确保责任压紧压实。

（2）突出攻坚要求，确保政策落实。一是坚持规划先行。按照规定 50 户以下、贫困发生率 50% 以上的村寨整体搬迁，全部在县城集中安置，推行“一步搬到位”。二是坚持标准安置。严格控制住房面积和建房成本，按人均 20 m² 进行安置，建房成本控制在 1500 元/m² 左右，装修成本控制在 300 元/m² 以内。为减轻搬迁群众负担，对 2016 年自行装修的搬迁户，按人均 20 平方米、每平方米 200 元给予装修补助。2016—2018 年，共建房 360309 m² 安置 4314 户 18316 人，人均安置面积 19.67 m²。三是规范资金管理。严格按照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原则使用搬迁工程资金。目前，2016-2018 年项目资金应到位 11.1 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1.3 亿元、省级统筹 8.5 亿元、县级融资 1.24 亿元），已到位 11.1 亿元，已拨付 10.105

亿元。

(3) 突出目标导向，确保工作落实。一是强化宣传动员，精准锁定对象。针对符合易地扶贫搬迁区域条件的村寨，组织帮扶单位、村级指挥所、结对帮扶干部、网格员和村组干进村入户，让符合条件的群众应搬尽搬。二是科学谋划选址，集中安置县城。以搬迁群众的后续发展为出发点，在县城中心区规划建设寨坝、永灵、塘边、新穗、将军府、经济开发区 6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注重安置小区空间布局，确保 2 公里范围内有园区支撑就业，1 公里范围内有高铁站、行政（政务）中心方便出行和办事，0.5 公里范围内有学校、医院和农贸市场方便就学、就医、购物，每个安置小区门口设有公交站点方便出行，使得搬迁群众生活更加便利。三是狠抓项目建设，如期搬迁入住。坚持县级集中统一建设，把 6 个安置小区建设列入县年度重点项目挂牌督办，确保移民群众按时“搬得出”。目前，所有安置房均已建设完成，移民群众全部按时搬迁入住。

(4) 强化后续服务，促进移民发展。一是完善移民服务中心建设。采取与村级办公场所共建方式，成立了 5 个移民后续管理服务中心，设立综合服务窗口和服务中心等便民设施。二是开展移民就业服务。出台《三穗县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建立搬迁群众定点跟踪服务管理机制，实现所有搬迁家庭走访全覆盖，确保有一人以上劳动力家庭稳定就业。其余无劳动力的家庭低保覆盖 106 户 274 人，扶贫专岗安置就业 24 户 56 人，由子女赡养和父母照顾的 34 户 82 人，共 164 户 412 人。三是落实各项公共服务措施。出台《三穗县易地扶贫搬迁子女进城入学安置方案》，统筹安排各项工作保障移民子女均能实现就近入学；在保障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林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惠农政策权益不变的前提下，移民自主选择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医疗保险。四是强化社区服务管理。将易搬移民就近纳入 6 个村（社区）管理，推行“社区+网格长+楼长+搬迁户”管理模式，积极帮助解决困难问题，逐步引导移民在新的生活环境里找到归宿感，快速建立起对新生活的信心。五是强化移民感恩教育培训。通过开展入户宣讲、文艺进小区、张贴新旧房屋对比照片、道德讲堂等活动，增加搬迁群众城市生活常识，促进搬迁群众的互动交往和感情交流，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教育引导搬迁群众自觉拥护党的领导，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3.2.2 调研安置点现状

(1) 大龙开发区

大龙开发区是贵州省省级经济开发区，是铜仁市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 4 个安置地之一，“十三五”期间承接易地扶贫搬迁 26807 人，其中跨区域搬迁 26468 人（德江县 22468 人，石阡县 2000 人），截止 2019 年 7 月大龙经济开发区已全部完成搬迁任务且工作取得初步成效。调研区龙江新区项目总投资 25.98 亿元，建筑面积 58.16 万平方米。承接德江县、石阡县搬迁群众 2557 户 11474 人，涉及德江县 19 个乡镇 272 个行政村、石阡县 16 个乡镇 19 个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2168 户 9631 人，占 83.94%，2019 年 6 月全部搬迁入住完毕。大德新区原为公租房项目，因易地扶贫搬迁需要，投资 3500 万，划分三栋楼用于安置德江县搬迁群众，共搬迁 209 户 986 人。德龙新区项目总投资 20.61 亿元，建筑面积 45.72 万平方米，主要承接德江县搬迁群众 3061 户 14008 人，涉及德江县 19 个乡镇 272 个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2813 户 12881 人，占 91.95%，2019 年 6 月全部搬迁入住完毕。目前各个调研安置点已基本形成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有社区为民服务中心、医疗服务站、农贸市场、便民超市、文化活动室、红白事场所、综合超市、儿童游乐场、学校、公共厕所等。

(2) 三穗县

三穗县 2016 年度搬迁 4298 人，2017 年度搬迁 7274 人（含县内搬迁 6228 人，跨区域搬迁 1046 人），2018 年度搬迁 6605 人。三年实际完成搬迁 4314 户 18316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7626 人，同步搬迁人口 690 人），2016 年搬迁 915 户 4298 人、2017 年搬迁 1596 户 7274 人（县内搬迁 1392 户 6413 人、跨区域搬迁至凯里市 204 户 861 人）、2018 年搬迁 1803 户 6744 人。调研区彩虹社区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位于三穗县经济开发区核心区。社区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总投资 8.33 亿，建筑面积 29.4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 23.9 万平方米，商业面积 1.3 万平方米，建成安置房 2578 套，停车位 1795 个；共有 50 栋居民楼，共安置易地搬迁群众 2403 户 959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335 户 9333 人，同步搬迁 68 户 266 人，是三穗县最大的易地移民安置小区。

4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转型调查

4.1 调查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4.1.1 调查问卷的设计

问卷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有文化程度、劳动力水平、健康程度和技能培训等方面。自然资本主要对其旱地、山林、水田的面积、质量以及流转情况进行调查。物质资本主要对搬迁农户的房屋面积、结构、价值以及交通工具拥有情况进行了调查。金融资本针对个人来说一般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等，但考虑到农户的特点，他们普遍现金流和存款很少，甚至为零，所以此次问卷有关金融资本的内容集中为家庭年收入以及特惠贷的调查。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遇到困难获得帮助的途径、亲戚中是否有公务员以及人情礼金、社会帮扶搬迁前后的变化等。

4.1.2 调查的范围

为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易地扶贫搬迁后的状况，调研小组于 2019 年 9 月、10 月两次深入到各个移民安置点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农户，共选取了大龙开发区龙江、大德以及德龙新区、三穗县彩虹社区四个代表性的安置点进行抽样调研。此次以户为单位共发放 390 份问卷，实际获得有效问卷 387 份，回收率为 99.2%。调查方式为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在访谈的过程中增加了村干部的深度访谈，以期更加客观的了解搬迁后农户的生计状况。

4.1.3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1) 从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来看：受访农户中男性为 247 人，占比 63.8%，女性为 140 人，占比为 36.2%。此次调查受访者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其中 30-40 岁和 40-50 岁的人居多分别为 112 和 106 人；其次为 50-60 岁的人共 78 人，占比 20.2%；而 20-30 岁和 60 岁以上的人数较少分别为 37 和 52 人，最后 20 岁以下的人数最少仅有 2 人。由此可以看出受访农户趋向于男性中老年，主要是因为家里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外出务工，只剩下中老年人。而且一般都是男性当家作主，对家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一般都由男性出面回答。

(2) 从受访者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最多，有 130 人，占比 33.6%；小学以下的有 106 人，占比 27.4%；初中的有 121

人，占比 31.3%；高中的有 19 人，占比 4.9%；大专及以上的仅有 11 人，占比 2.8%。从受访者健康状况来看：受访农户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健康状况为良好的人数最多为 233 人，占比 60.2%；偶尔小病的为 47 人，占比 12.2%；身体不好的为 107 人，占比 27.6%。

表 4-1 移民基本特征描述

基本信息	特征	样本数	比例
性别	男	247	63.8%
	女	140	36.2%
年龄	20 岁以下	2	0.5%
	20-30 岁	37	9.6%
	30-40 岁	112	28.9%
	40-50 岁	106	27.4%
	50-60 岁	78	20.2%
	60 岁以上	52	13.4%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106	27.4%
	小学	130	33.6%
	初中	121	31.3%
	高中	19	4.9%
	大学以上	11	2.8%
健康状况	身体不好	107	27.6%
	偶尔小病	47	12.2%
	良好	233	60.2%

4.2 农户生计方式的变化

生计方式是指人们对自身生计资本进行优化组合以及合理配置而选择谋求生计的方式。根据调研数据可知，搬迁前农户的生计方式分为 4 类。务农、务工、兼农户（务农+务工）、经商，我们将务农收入占据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定义为务农，以务工收入占据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我们定义为务工。搬迁后农户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本文将农户的生计方式划分为 6 类，分别为：务农、外地务工、本地务工、经商和公益性岗位以及其他（无业或学生）。搬迁后农户生方式的统计结果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搬迁前后生计方式对比表

搬迁前	频数(户)	比率(%)	搬迁后	频数(户)	比率(%)
务农	171	44.2%	务农	9	5.3%
			外地务工	19	11.1%
			本地务工	97	56.7%
			经商	15	8.8%
			公益性岗位	18	10.5%
务工	211	54.5%	其他	20	7.6%
			务农	0	0%
			外地务工	55	26.1%
			本地务工	122	57.8%
			经商	31	14.7%
经商	5	1.3%	公益性岗位	3	1.4%
			本地务工	3	0.6%
			经商	2	0.4%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农户的生计组合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调查的 387 户家庭中有 321 户实现了生计转型,有 66 户未实现生计转型。搬迁前从事务农的农户有 171 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 44.2%,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对该部分农户的生计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搬迁后这部分农户仅有 9 户未改变生计方式继续选择务农为生。这部分农户源于彩虹社区,原居住地仅离社区几公里左右,搬迁后没有生活技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回去继续耕种。而其他农户大多都远离原居住地,例如大龙经济开发区的搬迁农户基本由德江和石阡搬迁而来(德江至大龙开发区 277 公里,石阡至大龙开发区 170 公里)无法回到原居住地继续耕种,生计方式由此必须发生改变。19 户选择外出务工,占原务农人数的 11.1%,无土安置的方式促使他们选择外出务工。97 户选择本地务工,占原务农人数的 56.7%,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就业政策并结合工厂、产业园区等为农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大龙经济开发区抢国家发展新能源产业机遇,园区内引进新能源材料企业 11 家。创业的农户仅有 15 户,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搬迁户由于文化的限制不敢从事冒险的生计方式。从事公益性岗位的

农户占到了 10.5%，主要为两类人群，一类是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女性从事居委会工作，另一类是年纪在 50 岁左右但无劳动技能的人群从事保洁员、护林员、保安等工作。但也有 7.6%的家庭仅靠低保为生。

搬迁前从事务工的农户有 211 户，占调查农户的 54.5%，搬迁后这部分农户未向务农转型，这是因为搬迁前该家庭一直以外出务工为生，再加上安置点的无土安置，所以这部分农户不会再去选择务农。55 户依旧选择外出务工，占原务工人数的 21.6%，这部分农户在外务工多年，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所以搬迁后选择继续在外务工。122 户选择本地务工，占原务工人数的 57.8%，由于外出务工多年，具备一定的技能再加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解决就业的政策，很容易在安置地附近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安置小区周边范围内有学校、医院和农贸市场方便就学、就医、购物，一部分搬迁户考虑到孩子的成长问题转向本地务工。31 户选择经商，占原务工人数的 14.7%，外出务工多年见过世面并有一定的积蓄加上政府扶贫政策提供的便利做起了小本生意。而搬迁前经商的 5 户中有 2 户选择了本地务工，其余 3 户生计方式未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生计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农户生计组合方式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减少的务农农户主要转向本地务工；从事公益性岗位从无到有，从事务农农户大幅减少，本地务工农户增加，农户生计组合方式更加科学合理。

4.3 农户生计资本定量分析

4.3.1 生计资本评价体系

本次研究通过将生计资本量化，对 321 户搬迁前后发生生计转型家庭的生计资本变化进行分析评价。分析选取了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及劳动力规模为评价指标对人力资本进行分析评价；以旱地面积、山林面积、水田面积及三块地如何处置为评价指标对自然资本进行分析评价；选取了住房结构、房屋面积及交通工具数量为评价指标对物质资本进行评价；以家庭年收入和有无金融机构贷款为评价指标分析评价农户金融资本；以遇到困难获得的帮助渠道和亲戚中有无公务员为指标对社会资本进行评价。各资本类型的具体定义见表 4-3。

表 4-3 生计资本定义表

资本类型		指标说明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大专/大学及以上=5
人力资本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之和
	参加技能培训	家庭参加技能培训次数之和
	旱地面积	家庭拥有的旱地面积之和
	山林面积	家庭拥有的山林面积之和
自然资本	水田面积	家庭拥有的水田面积之和
	三块地如何处置	荒废闲置=1, 继续耕种=2, 已流转=3, 退耕还林=4, 其他=5
	住房结构	土木=1, 砖木=2, 砖混=3, 钢混=4
物质资本	房屋面积	住房面积
	交通工具数量	电动车、摩托车、小轿车等交通工具数量
金融资本	家庭年收入	1万以下=1, 1-2万元=2, 2-3万元=3, 3-4万元=4, 4-5万元=5, 5-6万=6, 6万以上=7
	是否申请过金融机构贷款	否=0, 是, 但没有贷到=1, 是, 并贷到了款=2
社会资本	遇到困难获得帮助的渠道	亲戚=1, 邻居=2, 朋友=3, 干部或组织=4
	亲戚朋友中有无公务员	亲戚朋友中是公务员的人数

4.3.2 权重及综合资本指数的确定

搬迁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尤为重要, 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估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为了更好的衡量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动情况, 本文采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对生计资本的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分析。

1. 指标标准化。假设有 n 个调查对象, m 个评价指标, 样本数据标准化计算公式:

$$Y_{ij} = \left| \frac{X_{ij} - \text{Min}(X_j)}{\text{Max}(X_j) - \text{Min}(X_j)} \right| \quad \text{式 1}$$

i 代表调查对象, j 代表评价指标, 则 X_{ij} 代表第 i 个调查对象的第 j 项指标数, $\text{Max}(X_j)$ 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 $\text{Min}(X_j)$ 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小值。

2. 熵权法计算权重。根据熵的定义, 一项指标的信息熵为:

$$E_j = -K \sum_{i=1}^n P_{ij} \ln P_{ij} \quad \text{式 2}$$

其中 $K = \frac{1}{\ln n}$, $K > 0$, $P_{ij} = \frac{Y_{ij}}{\sum_{i=1}^n Y_{ij}}$, 第 j 项指标的差异项系数 $F_j = 1 - E_j$, 则

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为： $W_j = \frac{F_j}{\sum_{i=1}^m F_i}$

3. 根据各项生计指标的权重和标准化后的值。各分项生计资本得分：

$$D_i = \sum_{j=1}^n W_{ij} Z_{ij} \quad \text{式 3}$$

其中 W_{ij} 为第 i 项生计资本的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Z_{ij} 为第 i 项生计资本的第 j 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D_i 为第 i 项生计资本值

4.3.3 生计资本结果分析

通过测试各指标的权重及各生计资本的资本值，分析调研区域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具体见表 4-4 所示：

表 4-4 搬迁前后生计资本权重量化表

资本类型	指标说明	指标符号	搬迁前权重	搬迁后权重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H1	0.45	0.44
	家庭劳动力数量	H2	0.18	0.41
	参加技能培训	H3	0.37	0.15
自然资本	旱地面积	N1	0.20	0.15
	山林面积	N2	0.42	0.31
	水田面积	N3	0.17	0.13
物质资本	旱、林、田如何处置	N4	0.21	0.41
	住房结构	P1	0.3	0.56
	住房面积	P2	0.36	0.08
金融资本	交通工具数量	P3	0.34	0.36
	家庭年收入	F1	0.35	0.25
社会资本	是否申请过金融机构贷款	F2	0.65	0.75
	遇到困难获得帮助的渠道	S1	0.47	0.41
	亲戚中有无公务员	S2	0.53	0.59

表 4-5 搬迁前生计资本得分表

生计资本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弱资本性		强资本性	
				频数(户)	频率(%)	频数(户)	频率(%)
人力资本	60.56	95.02	74.49	154	48%	167	52%
自然资本	53.62	95.61	76.67	146	45.5%	175	54.5%
物质资本	70.65	94.44	78.81	163	50.8%	158	49.2%
金融资本	57.96	92.16	68.01	274	85.4%	47	14.6%
社会资本	60.66	98.19	74.65	161	50.2%	160	49.8%

表 4-6 搬迁后生计资本得分表

生计资本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弱资本性		强资本性	
				频数(户)	频率(%)	频数(户)	频率(%)
人力资本	60.22	96.99	82.13	142	44.2%	179	55.8%
自然资本	59.62	99.07	81.08	157	48.9%	171	51.1%
物质资本	79.33	94.70	84.54	175	54.5%	146	45.5%
金融资本	55.79	91.00	70.01	217	67.6%	104	32.4%
社会资本	59.50	98.20	76.98	147	45.8%	174	54.2%

由表 4-4、4-5 和表 4-6 结果得出，搬迁农户在搬迁前的各项生计资本排序为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说明搬迁前限制农户生计资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搬迁后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排序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说明搬迁后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其生计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限制因素。搬迁前后农户拥有的物质资本相对来说最为丰富，但农户的金融资本始终处于最低的状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扶贫的重要举措，不仅改变了农户原有的生计方式，也使搬迁农户五项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方式产生显著差异。农户在搬迁后的生计资本存量普遍都比较高，搬迁前后农户的物质资本均值分别为 78.81 和 84.54，；自然资本均值分别为 76.67 和 81.08；社会资本均值分别为 74.65 和 76.98；人力资本均值分别为 74.49 和 82.13；金融资本均值分别为 68.56 和 70.59，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有效提高了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

4.3.4 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的描述个体之间不同资本水平的差异，本文以各类资本的均值为标准，将低于均值的农户划分为弱资本性，将高于均值的农户划分为强资本性。

(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通过生产活动产生劳动收入的人力输入，本文以文化程度、参加技能培训次数和家庭劳动力为评价因子对人力资本进行研究评价。搬迁前有 48%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性状态，52%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性状态；搬迁后有 44.2%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状态，55.8%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状态。搬迁后农户的人力资本储量明显高于搬迁前 (74.49, 82.13)，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搬迁农户参加

技能培训次数上面，搬迁前 83.2%的家庭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10.3%的家庭参加过一次技能培训，仅有 6.5%的家庭参加过两次及以上的技能培训；搬迁后未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家庭减少到 51.6%，26.8%的家庭参加了一次技能培训，15%的家庭参加了两次技能培训，6.6%的家庭参加了三次及以上的技能培训，具体如表 4-7，图 4-1 所示。调研区农户参加了家政工、砌筑工等不同职业的技能培训，并取得了相应的合格证书，如果培训完成未实现就业，政府还会组织进行不同工种的二次培训。经过培训，农户的职业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家庭劳动力数量上升，转化为稳定的工资收入，优化了生计组合方式，促使人力资本不断改善。调研区搬迁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属于初中及以下水平，文化程度的提高要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而调研区的农户 2017、2018 年搬入的居多，所以目前对搬迁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明显。但各个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妥善安排搬迁农户子女就近入学，减轻孩子上学形成的负担，这些都有利于未来搬迁农户家庭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表 4-7 搬迁前后技能培训情况

技能培训次数	频数(户)		比率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0	267	164	83.2%	51%
1	33	86	10.3%	26.8%
2	19	49	5.9%	15.3%
3	2	15	0.6%	4.7%
4	0	5	0	1.6%
5 及以上	0	2	0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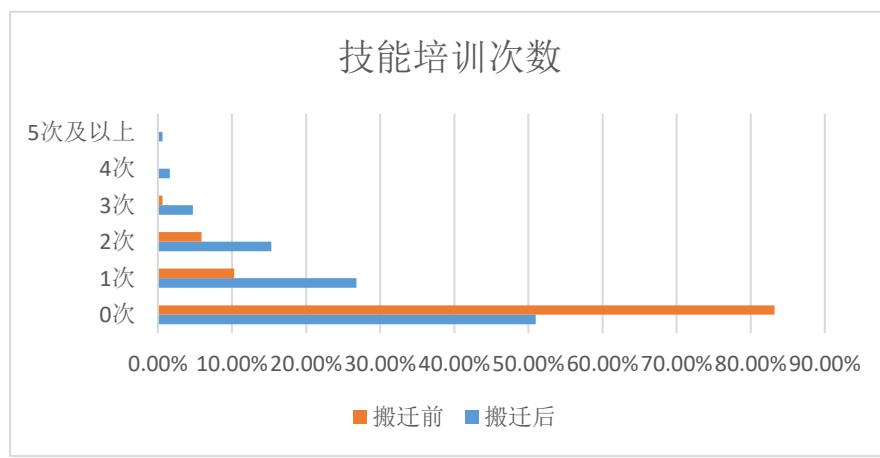


图 4-1 搬迁前后技能培训情况

(2)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主要指土地、山林、鱼塘等生产所需又可自由支配的资源，本文以旱地面积、山林面积、水田面积和三块地如何处置作为评价因子对自然资本进行研究评价。搬迁前有 45.5%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性状态，54.5%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性状态；搬迁后有 48.9%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状态，51.1%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状态。其自然资本均值由搬迁前的 76.04 增至搬迁后的 81.08，表明搬迁后农户的自然资本储量明显高于搬迁前，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块地的处置上面。调研过程中发现搬迁后农户大多远离原居住地，无法继续耕种原有土地，为此政府对有流转价值的承包地和山林地，引导农户以市场化形式土地流转经营；对于一时难以流转的土地，由县级国有平台公司以统一打包开发经营或者保底价收储流转形式处理土地。政府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折股量化形式给搬迁户，让他们按股来分享利益。样本中有 114 户家庭选择了流转，占比 35.5%。流转金额在 500 元以下的比例为 42.1%；土地流转金额在 500-1000 元的比例为 27.2%；土地流转金额在 1000-2000 元的比例为 16.7%；土地流转金额在 2000-3000 元的比例为 7.9%；土地流转金额在 3000 元以上的比例为 6.1%。说明农户进行农地流转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收益水平普遍不高，而且一部分采取分红的形式，由于种植果树、辣椒等取得收益需要时间，所以还未取得分红，具体如表 4-8。

表 4-8 搬迁后土地流转金额

流转金额	频数（户）	比率
500 以下	48	42.1%
500-1000	31	27.2%
1000-2000	19	16.7%
2000-3000	9	7.9%
3000 以上	7	6.1%

(3)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是指农户生活和生产所需的有形资本，代表着农户的生活水平。本文从住房结构、住房面积和交通工具数量作为评价因子对自然资本进行研究评价。搬迁前有 50.8%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性状态，49.2%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性状态；搬迁后有 54.5%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状态，45.5%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状态，其物质资本均值由搬迁前的 78.81 增长至搬迁后的 84.54，增长差异显著。搬迁前后农户的物质资本总量都是最大的，农户的物质资本主要体现在住房情况和交

交通工具数量两个方面，是家庭的购买能力所决定的。易地扶贫搬迁后政府为搬迁户免费提供住房并进行装修，在改善搬迁农户住房条件的同时减轻农户的负担，确保农户不因搬迁而负债。在住房方面，搬迁前住房为土木结构的有 65.1% 的家庭，为砖木结构的有 21.5% 的家庭，为砖混结构的有 12.8% 的家庭，为钢混结构的有 0.6% 的家庭；搬迁后砖混结构的住房已增至 33.3%，有 66.7% 的受访者住房结构为钢混，由此看出农户住房结构由土木为主向砖混转变，房屋条件的到了极大的改善，具体如表 4-9，图 4-2 所示。在交通工具方面，搬迁前拥有比例较高的是摩托车占比为 21.2%，而拥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家庭甚少。究其原因：搬迁户家庭没有购买小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能力。随着安置点道路、设施等公共资源的改善，搬迁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安置点拥有摩托车的家庭从 21.2% 上升到 38.3%，农户也开始购买价值较高的小轿车、三轮车、货车等。搬迁后政府为每家都配备家具五件套以及少量生活必备家电等。但也有一些家庭没有购买交通工具，主要因为政府注重安置小区空间布局，搬迁群众可实现家门口就医、就学、就业。如彩虹社区生活便利，门口为 2、3 路公交车站台，社区内有平价超市、红喜宴会厅等，距农贸市场 1.5 公里；社区紧邻八弓镇中心幼儿园、第三小学，方便了搬迁群众子女就近入学；此外社区内设有卫生室，距县医院、八弓镇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构仅 1.5 公里，可为搬迁群众提供便利医疗服务；社区紧邻远航广电、汽配园、闽台科技园等大型企业和科技园区等大型企业和科技园，搬迁群众可实现家门口就业。具体如表 4-10，图 4-3 所示。

表 4-9 搬迁前后房屋结构变化情况

房屋结构	频数（户）		比率（%）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土木	209	0	65.1%	0%
砖木	69	0	21.5%	0%
砖混	41	107	12.8%	33.3%
钢混	2	214	0.6%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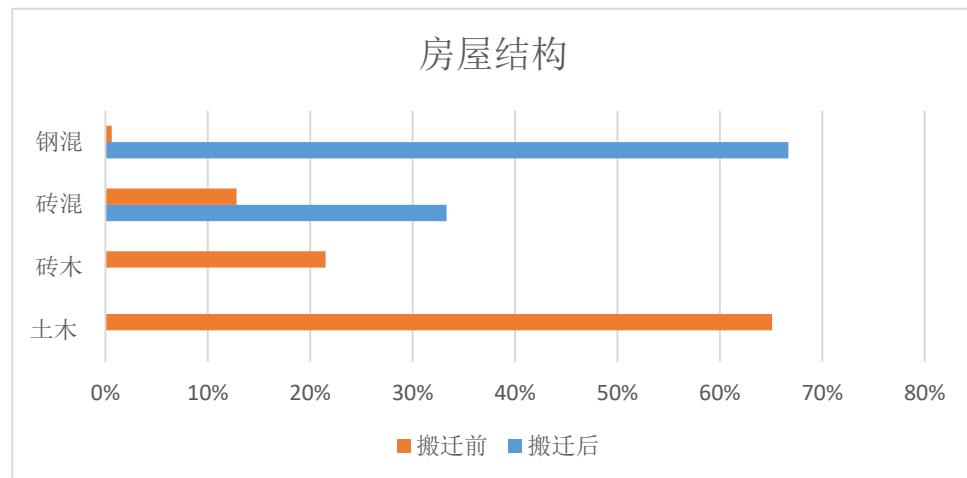


图 4-2 搬迁前后房屋结构变化情况

表 4-10 搬迁前后交通工具变化情况

电器数量	频数(户)		观察值比率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电动车	4	24	1.2%	7.5%
摩托车	68	123	21.2%	38.3%
三轮车	7	8	2.2%	2.5%
小轿车	6	19	1.9%	5.9%
货车	2	5	0.6%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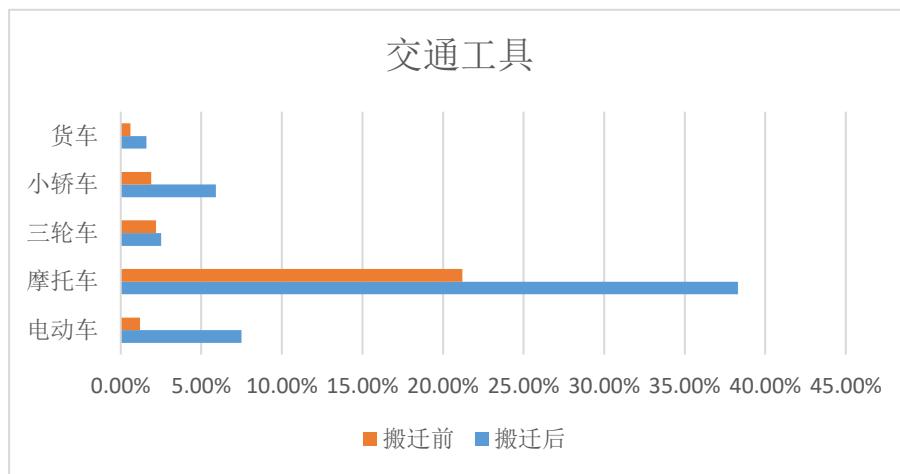


图 4-3 搬迁前后交通工具变化情况

(4) 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能够为农户提供生产活动所需资本或解决其生存问题，主要以资金或者潜在的资金支持存在，对于农户实现生计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家庭年收入、是否申请金融机构贷款为评价因子对金融资本进行分析评价。搬迁前有 85.4%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性状态，14.6%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性状

态；搬迁后有 67.6%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状态，32.4%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状态，其金融资本均值由搬迁前的 68.01 增至搬迁后的 70.01，虽有增长但差异不凸显。表明搬迁后农户的金融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还是有 67.6%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状态，依然有待加强。搬迁前农户年收入来源很少，通过自家耕种减少消费性支出，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在借款方面基本选择向亲戚借款，不信任正规金融机构，无贷款意识。然而易地扶贫搬迁后，当地政府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特惠贷是受政府极力宣传和鼓励的一种贷款，政府引导农户先贷款后投资，在投资协议中确保贫困农户的保底年收益率不低于 8%，等于贫困农户每年最低能够获得 4000 元收入，增加了农户获取信贷的渠道，所以搬迁后农户有申请过贷款并且贷到了款的比例由搬迁前的 14% 上升到了 28.7%，农户用贷款租赁门面做起了生意又或者进行投资取得投资收益等，增加了搬迁农户的收入来源，具体如表 4-11，图 4-4 所示。

表 4-11 搬迁前后金融机构情况

金融机构贷款	频数(户)		比率(%)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否	274	217	85.4%	67.6%
是，但没有贷到	2	12	0.6%	3.7%
是，并贷到了款	45	92	14%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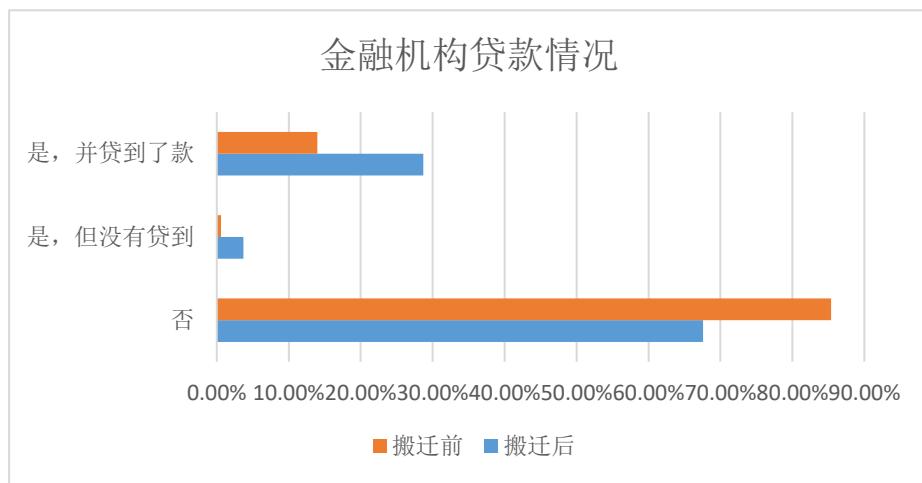


图 4-4 搬迁前后金融机构情况

(5)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具有并能利用的社会相关资源，以农户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存在。本文以集体事物参与程度、遇到困难获得帮助的途径、亲戚中是否有公

务员作为评价因子对农户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评价。搬迁前有 50.2%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性状态，49.8%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性状态；搬迁后有 45.8% 的农户处于弱资本状态，54.2% 的农户处于强资本状态。其社会资本均值由搬迁前的 74.65 增至搬迁后的 76.98，表明搬迁后农户的社会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大多数搬迁农户的亲戚朋友中都没有村干部或者公务员，这说明农户在这方面的社会资源较少。同时政府十分重视农户搬迁后的生活需求，实行结对帮扶政策，尽可能的解决搬迁农户遇到的问题。调研发现，搬迁前农户参加集体事物的积极性处于一般水平，而且有 60.7% 的农户遇到困难都依赖于亲戚，只有 22.1% 的农户遇到困难会向干部或组织寻求帮助；搬迁后参加集体事物的积极性也稳步提升，而且政府的各种技能培训、优惠扶持政策以及政府补贴等，使他们越来越信任组织，遇到困难时农户主动向组织、干部寻求帮助的比例也提高到 47.7%，具体如表 4-12，图 4-5 所示。

表 4-12 搬迁前后获得帮助的途径

获得帮助的途径	频数(户)		比率(%)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亲戚	195	109	60.7%	34%
邻居	41	42	12.8%	13%
朋友	14	17	4.4%	5.3%
干部或组织	71	153	22.1%	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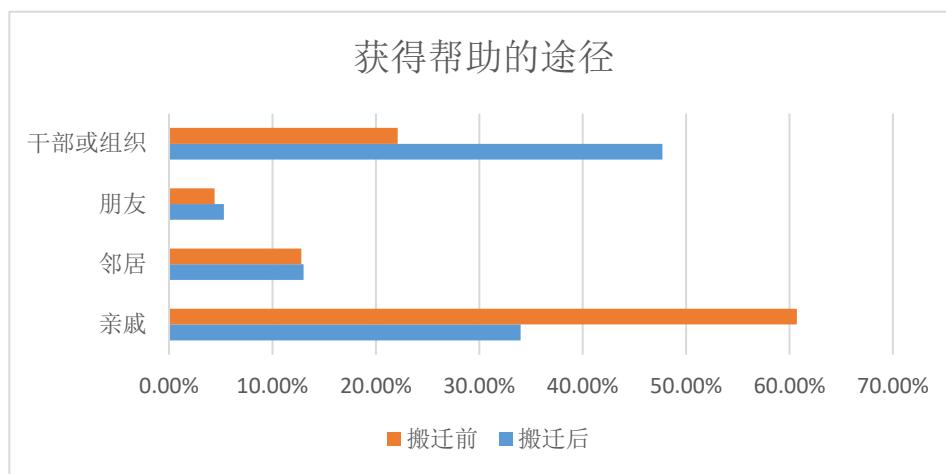


图 4-5 搬迁前后获得帮助的途径

4.4 农户生计结果的变化

生计结果是人们通过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来实现生计活动的产出，这个结果反映在被安置农户的就业及收入情况上，主要指标是被安置农户能否稳定就业及

固定收入的多少。搬迁后，农户的生计收入有了较大的提升。如表 4-13 所示：通过比较被安置农户搬迁前后的家庭年收入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被安置农户搬迁后年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主要体现在中低收入农户比例下降及中高收入农户比例上升，搬迁后年收入低于 1 万元的农户比例从 19.9% 降至 11.6%；搬迁后年收入低于 2 万元的农户比例从 38.9% 降至 25.3%，搬迁后年收入在 2-5 万元之间的农户比例由 48% 上升 54.2%，这说明易地搬迁扶贫能够显著提高被安置农户的收入水平。搬迁前农户主要从事养殖业、种植业、或选择外出务工，大多依靠农业、务工等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搬迁后由于当地政府的扶持，搬迁农户改变了原有的生计方式，减少了务农，拓宽就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表 4-13 搬迁前后家庭年收入变化情况

年收入	频数（户）		比率	
	搬迁前	搬迁后	搬迁前	搬迁后
1 万元以下	46	23	14.3%	7.2%
1-2 万元	79	58	24.6%	18.1%
2-3 万元	70	57	21.8%	17.8%
3-4 万元	52	63	16.2%	19.6%
4-5 万元	32	54	10%	16.8%
5-6 万	24	39	7.5%	12.1%
6 万元以上	18	27	5.6%	8.4%

4.5 小结

分析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大多数被安置农户经历了生计转型，生计方式由单一务农、务工转变为除务农、务工之外的自主创业、公益性岗位和就近就业等，生计方式实现了多样化。同时搬迁前后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也存在着差异，通过对比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发现搬迁后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明显提高，其中相对丰富的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但搬迁前后金融资本始终是限制研究区农户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积累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较高的收入积累，政府应该积极引导金融政策和金融机构向被安置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被安置农户的收入水平。

5 基于 Logistic 模型对移民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贵州贫困地区的调研，我们可以发现，贵州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具有生计资本存量小，生计脆弱性高及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调查结果显示，搬迁后被安置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有了明显提高，各项生计资本的存量也发生了变化，各项生计资本存量的多少决定了农户生计方式的方向，生计方式的转变决定于农户的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体现了被安置农户的生计转型是否成功。被安置农户根据搬迁后的生计资本变化及存量，调整相应的生计活动，目的是获得最优的生计结果，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5.1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5.1.1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当被解释变量为 1 或 0 的二分类变量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对当解释变量为 x_i 时被解释变量 $y=1$ 的概率的预测，因此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推广即：

$$P_{y=1} = \beta_0 + \beta_1 X_1 \quad \text{式 4}$$

本文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因变量是贫困农户生计转型是否成功，即对应是和否两种情况，变量取值分别为 1 和 0。本文通过构建的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来判定搬迁后农户的生计转型是否成功。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搬迁农户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变化，从而分析得到搬迁群众生计转型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 = \frac{\text{Exp}(z)}{1+\text{Exp}(z)} \quad \text{式 5}$$

式中，P 为事件发生的概率，在本文中指搬迁农户转型是否成功的概率，如果 $P > 0.5$ ，可以预测该事件发生，否则预测不发生；Z 是变量 x_1, x_2, \dots, x_i 的线性组合：

$$Z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i X_i \quad \text{式 6}$$

变换后的公式为：

$$\text{Logit}(P) = \ln \frac{P}{1-P} = \beta_0 + \sum_{i=1}^k \beta_i X_i \quad \text{式 7}$$

模型的估计方程为在 x_i 的影响下，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概率。 x_i 为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所有影响农户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因素。

5.1.2 变量定义

(1) 文化程度：对于搬迁农户来说，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难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搬迁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2) 劳动力数量：对于搬迁农户来说，大多因病、因学致贫，劳动力数量紧缺。因此搬迁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3) 技能培训次数：搬迁农户接受技能培训的次数越多，通过掌握的技术，促进生计方式多样化，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低的问题。因此搬迁后家庭参加技能培训的次数越多，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4) 旱、林、田流转面积：搬迁后政府对有流转价值的旱地、山林、水田等引导组织农户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经营。因此家庭土地流转面积越多，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5) 旱、林、田流转金额：土地进行流转转化为资产性收入。因此家庭土地流转金额越高，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6) 房屋面积：物质资本最重要的是房屋，可以通过出租带来资产性收入，也可以自主经营带来经营性收入。因此搬迁后家庭拥有房屋面积越大，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7) 交通工具数量：交通工具的拥有量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搬迁家庭的生活质量。因此搬迁后家庭拥有交通工具的数量越多，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8) 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最直观的反映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是否成功。因此搬迁后家庭年收入越多，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9) 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易地扶贫搬迁后，大部分搬迁农户通过在安置地务工、经商、公益性岗位等生计方式获取收入，该收入成为搬迁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补充。因此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越高，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10) 是否申请金融贷款：国家为农户提供的特惠贷，即“5 万元以下、3 年

期以内、免除担保抵押”，搬迁后农户通过金融贷款，可以进行投资，发展产业等。因此搬迁后家庭申请金融贷款，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11) 人情往来收支是否增加：主要通过农户在婚丧嫁娶中获得的人情往来实现人情收支。因此随着人情往来收支的增加，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12) 政府帮扶是否增加：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深入推进，政府对不同程度贫困的搬迁农户给予相应的政府补助，增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政府帮扶越多，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表 5-1 自变量描述

生计资本	指标说明	单位或赋值	影响方向预测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x1)	小学以下=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大专/大学及以上=5	+
	家庭劳动力数量 (x2)	人	+
	参加技能培训 (x3)	次	+
自然资本	旱、林、田流转面积 (x4)	亩	+
	旱、林、田流转金额 (x5)	千元	+
物质资本	房屋面积 (x6)	平方米	+
	交通工具数量 (x7)	辆	+
	家庭年收入 (x8)	万元	+
金融资本	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 (x9)	万元	+
	是否申请金融贷款 (x10)	否=0, 是=1	+
社会资本	人情往来收支是否增加 (x11)	否=0, 是=1	+
	政府帮扶是否增加 (x12)	否=0, 是=1	+

5.2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自变量进行筛选，进入模型的标准是 $P < 0.05$ 。从最终模型的整体检验效果得出， -2 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 202.195，Nagelkerke R² 为 0.565，接近 0.5，说明模型可信度较高。因此，选择该模型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合适的。结果得出的显著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 (x₂)、技能培训次数 (x₃)、家庭年收入 (x₈)、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 (x₉)、政府帮扶变化程度 (x₁₂)。而其他变量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是否成功均不显著，具体来看，人力资本中搬迁农户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结果无显著影响；自然资本中仅有 35.5% 的农

户进行了旱、林、田的流转，虽然政府大力盘活迁出地资源，但效果还未凸显。因此流转面积和金额对结果无显著影响；物质资本中政府按照人均 20 m²的标准分房，而且大多数家庭仅拥有电动车、摩托车，拥有小轿车、货车的家庭仅有 5.9% 和 1.6%，可见大部分家庭仍处于一般消费水平，因此房屋面积、交通工具数量对结果均无显著影响；金融资本中仅有 27.8% 的人申请了金融贷款，搬迁农户普遍还是未有贷款意识，因此是否申请金融贷款对结果无显著影响；社会资本中人情往来的收支增加与否对搬迁户的影响并不大，原因在于政府通过开展入户宣讲、文艺进小区、道德讲堂等活动，促进搬迁农户的互动交往和感情交流，使得搬迁户快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而且有一部分是整村整寨搬迁影响并不大，因此人情往来收支是否增加对结果无显著影响。

表 5-2 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检验

生计资本	自变量	回归系数 B	标准差 S.E	Wald 检验 df	显著性 sig	Exp (B)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x1)	0.172	0.212	0.659 1	0.417	1.188
	家庭劳动力数量 (x2)	0.545	0.254	4.608 1	0.032**	1.725
	参加技能培训 (x3)	0.398	0.199	3.977 1	0.046**	1.488
自然资本	旱、林、田流转面积 (x4)	0.037	0.195	0.036 1	0.849	1.038
	旱、林、田流转金额 (x5)	0.393	0.915	0.184 1	0.668	1.481
物质资本	房屋面积 (x6)	0.002	0.008	0.052 1	0.819	1.002
	交通工具数量 (x7)	0.139	0.317	0.193 1	0.661	1.149
金融资本	家庭年收入 (x8)	0.665	0.149	19.953 1	0.000***	1.945
	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 (x9)	0.620	0.194	10.195 1	0.001***	1.859
	是否申请金融贷款 (x10)	0.383	0.445	0.742 1	0.389	1.467
社会资本	人情往来收支是否增加 (x11)	1.211	0.704	2.959 1	0.085	3.357
	政府帮扶是否增加 (x12)	1.200	0.504	5.669 1	0.017**	1.859
	常数	-4.878	1.082	20.317 1	0.000	0.008

注： p<0.01***; p<0.05**

由表 5-2 可知，人力资本中 x_2 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回归系数为 0.545，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0.032，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与生计转型之间呈现正向影响，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究其原因：一是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更有意愿把握当地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如大龙经济开发区开办 7 个就业扶贫车间（打火机厂、服装厂、锡纸厂等），解决 400 余人就业。搬迁前在家照顾孩子的妇女或年事已高的老人可以在家门口务工，收入按计件方式，多劳多得，做工家庭每月增加 1000 多元的收入。二是调研的安置点均开设“四点半课堂”活动，让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免费得到老师作业辅导或兴趣培养等服务。老师对学生进行作业辅导的同时注重普及知识，激发兴趣，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拓宽了视野也解决了需要接送孩子无法工作的问题，帮助农户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创收增收。三是易地扶贫搬迁后，政府开办医疗诊所方便群众就近就医，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这都有助于改善家庭半劳动的健康状况，使得家庭中全劳动力数量增加，从而有更多劳动力在当地通过打零工、经商等方式有效增加收入。因此农户家庭劳动力越多，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

由表 5-2 可知，人力资本中 x_3 技能培训次数的回归系数为 0.398，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0.046，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技能培训次数与生计转型是否成功之间呈现正向影响，即农户增加的技能培训次数越多，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越有可能成功。各个安置点对搬迁群众给予适当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其从过去单纯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各行各业的参与者，从而拓宽农户收入渠道，使生计方式多样化。如三穗县彩虹社区的搬迁农户基本都是苗族和侗族，因此政府开展竹编、刺绣等民族传统手工艺培训和电工、挖掘机驾驶、厨师等技能培训，不仅可以传承民族文化，还可以学得一技之长。积极引导易地扶贫搬迁少数民族群众发展民族特色产业，挖掘少数民族在饮食、服饰、节庆等方面的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群众用好民贸民品政策，引导民贸民品企业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灵活吸纳易地扶贫搬迁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务工，促进搬迁群众就业创业。由此可以看出，易地扶贫搬迁后，当地政府加大对农户技能培训（包括厨师、家政、保安及民族传统手工艺等培训）的力度，对于农户有效提高生计资本，使农户增收脱贫，增强农户家庭抗拒风险的能力，降低生计脆弱性，实现生计转型成功有重要影响，

因此农户参加技能培训的次数越多，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

由表 5-2 可知，金融资本中 x_8 家庭年收入的回归系数为 0.665，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0.000； x_9 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的回归系数为 0.62，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0.001，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家庭年收入、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与生计转型是否成功之间呈现正向影响。原因在于搬迁前农户从事的生计活动主要有种植业、养殖业、外出务工，大多依靠农业、外出务工等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搬迁后由于当地政府的扶持，搬迁农户改变了原有的生计方式，务农人数大幅度下降转向本地务工。目前在大龙经济开发区打火机产业链全面形成，现有打火机生产龙头企业 1 家，配套企业 9 家；此外，箱包生产产业链也初成规模，现有箱包生产企业 8 家、配套企业 13 家。同时将安置区门面、农贸市场通过廉价租赁方式支持搬迁户经营，落实各项搬迁政策。搬迁以来，成功扶持 444 名搬迁群众创业，创业年收入均在 3 万元以上。因此越来越多的搬迁农户选择在安置地务工、经商，与搬迁安置相关的收入越来越多，该收入成为搬迁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补充，家庭年收入也越来越多。因此农户与搬迁安置相关的收入、家庭年收入越多，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

由表 5-2 可知，社会资本中 x_{12} 政府帮扶是否增加的回归系数为 1.2，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0.017，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政府帮扶是否增加与生计转型之间呈现正向影响，即政府帮扶增加，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高。调研区域的工作重点是帮助搬迁群众融入城镇，同时深入开展“四帮”服务即帮助引导群众搬迁、帮助融入城镇生活、帮助实现就业创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此外，服务队下到安置社区逐一排查群众的生活困难，并针对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开展走访慰问以解决燃眉之急。政府为搬迁农户新增了政府补贴、公益性岗位等相关收入，使得搬迁农户收入来源更多样化，实现了搬迁户向搬迁富的转变，搬出群众幸福感。因此政府的帮扶越多，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

5.3 基于实际调研的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的结果，不难得出，贵州省总体的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显著。而且由转型成功农户的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大力的扶贫政策和措施的扶持下，贵

州搬迁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户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跨省务工转向省内就近务工，农户生计组合方式更加科学合理。正是因为贵州省比较注重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的地区很多，所以为总结吸取贵州各地的扶贫搬迁经验，2019年易地扶贫搬迁的全国现场会就在贵州召开。基于实际调研，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5.3.1 技能培训促进生计转型

近年来贵州省全面开展对农户的技能培训活动，并为培训合格的学员提供工作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在这些扶贫培训的过程中，农户的劳动技能得到了很大地提高，并最终转化为工资性收入。大龙经济开发区开展全员培训，累计开展电工、焊工、厨师、挖掘机、种植养殖等实用技能培训42期2661人次。搬迁群众中劳动力共计12163人，就业创业10985人，就业率达到90.31%。三穗县更是按月动态管理更新搬迁群众培训就业信息，根据群众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对有培训意愿的搬迁劳动力开展针对性全员培训，提升就业技能，并结合少数民族特点鼓励和支持竹编工艺等扶贫车间进小区，让搬迁群众实现居家有就业。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不难发现很多搬迁农户通过技能培训获得了稳定的工作，诸如德龙新区的刘*，搬迁前仅靠丈夫在当地打打零工维持收入，生活条件较差；搬迁后参加了组装打火机的技能培训，每天把孩子送去上学后就来到社区旁的东亿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组装打火机，而丈夫也去了其他工厂做工，一家人每个月能拿到4000元左右的收入。对于从来没上过班的刘*来说，现在的生活让她感觉到很充实，不仅可以每月按时拿工资，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读书难的问题，生活更加有奔头。劳动技能的提高，促使人力资本不断提高，转化为工资性收入，因此应当注重加强技能培训。

5.3.2 农业发展促进生计转型

目前，自然资本与农户是否转型成功仍然有一定的关系。大龙开发区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土地、弃土场来发展农业产业，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搬迁户”的发展模式，建立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如龙江新区成立大龙便民果蔬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利用土地复垦项目发展种植业，种植小米椒。一心村辣椒基地主要解决“50岁-70岁”年龄段有就业需求的务工群体就业，其中170亩种植小米椒，30亩计划种植花生，经济效益可观。基地50%的产业利润用于帮扶搬迁农

户，30%的利润用于入股群众分红，20%的利润用于扩大产业发展。例如搬迁户田**在老家的时候干农活习惯了，小米椒种植基地成立后立马报了名，在种植基地干的同时利用休息时间还在周边打些零工，挣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误。同时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已经有一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实现了农业的升级转型。赵**共有5亩的土地，其中4亩进行了流转共得收入1600元。目前贵州省确权登记承包耕地，清楚界定山林地的权属，拆除旧房复垦旧宅基地，并将复垦后的土地分类确权颁证给搬迁户并享受相应的承包经营权，以此来保障搬迁群众的土地惠利政策不变。但是，这种转型农业仍然不是很普遍，多数的贵州搬迁农户的土地流转效果并不是很好，这就是需要直面的客观事实。因此贵州在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转型的后续过程中应当注重盘活自然资源，提高财产性收入。

5.3.3 金融扶贫促进生计转型

搬迁后的农户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申请“特惠贷”的农户也因为该贷款方式获得了大量的生计收入。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申请“特惠贷”的农户进行投资当年的家庭收入最少增加了4000元/年，也有很多搬迁农户通过申请贷款获取经营资金租赁安置区门面、农贸市场等做起了生意。如搬迁户杨**，在老家的时候山一户水一户的不适合做生意，种地只能勉强存活，所以只能外出务工；现在搬到新家后申请了特惠贷开了家百货店，社区内群众多，生活用品、小吃零食等需求大，生意很不错，不用再漂泊在外不能兼顾家庭了。其实，金融扶贫除了“特惠贷”还有许多配套的扶贫措施，如“雁归工程”、小额创业贷款、“3个15万”等就业创业政策。大龙恒泰橡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就是落户大龙开发区雁归工程产业园的第一家公司，为搬迁群众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

5.3.4 城市融合促进生计转型

搬迁农户搬迁到新的安置点后，引导农户参与社区的自我管理，推进搬迁农户的深度融合，使农民向市民转化，融入社区和城市尤为重要。为此大龙经济开发区开展“文明楼栋”、“好邻里”等活动；设立安全教育中心，培训搬迁群众的城市生活方式，宣传交通、消防、燃气安全等防范意识，共同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搬迁的同时也聚焦文化的融合，傩戏面具、土家族用的织布机、风簸等独具民族风情的老物件陈列在乡愁馆；布局土家族傩戏文化、侗族箫笛文化为代表的元素，发扬德江滚龙、玉屏花灯，既展示迁出地的乡愁文化，也展示迁入地

的乡愁文化，促进文化融合。德龙三期的搬迁户杨**以前最喜欢听傩戏，本以为搬迁后再难接触到老家的傩戏文化，没想到社区不仅帮助他搬了过来，还把老家的文化搬了过来，帮他解了搬离故土的相思之情，增添了归属感、幸福感。三穗县则结合农村群众农闲时节和茶余饭后有串门拉家常的习惯，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族表演活动，融入城市现代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促进各民族同台唱戏，促进社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进。因此，在搬迁的后续工作中应当提升搬迁群众新市民思想意识，帮助其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升了搬迁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4 小结

综上所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技能培训次数、家庭年收入、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政府帮扶是否增加，对调研区域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是否成功有显著影响。结合实际调研的情况，安置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同时为农户提供各种技能培训，发展特色农业，开展金融扶持降低农户的信贷难度，增加了收入来源，也使得农户的生计方式更加多样化，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6 促进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对策建议

6.1 加强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创业

近年来，贵州省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进行了多次技能培训并组织培训合格的学员进行就业，通过技能培训农户的劳动技能得到了很大地提高，最终促使农户稳定就业。通过贵州省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调研分析，不难发现劳动技能的提升对于改善搬迁农户的生计收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例如，思南县塘头关中坝安置点就根据安置点的基本情况组织了保安、种养殖等技能培训，引进鞋厂家门口务工；依托国家级农业园区，组织引导搬迁户到园区务工；投入扶贫项目到专业合作社养虾，让搬迁农户分红等。使得农户生计方式实现非农化转变，确保了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因此政府应当围绕各地用工需要和产业发展需求，对未就业劳动力开展工作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有业可就。首先，政府应当根据省内外用人单位的需求开展定期培训，以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旅游业等大容量行业为主，鼓励企业通过定岗培训和在岗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展开培训以适应企业用工的需求；其次，政府应当对有外出就业意愿的搬迁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向、定岗培训，提升其劳动技能。而对于就近就业意愿的农户，应根据地方产业发展实际，开展实用技术、旅游服务、电子商务等培训；最后，注重引导搬迁家庭中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鼓励其就读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等，接受专业化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6.2 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产业升级

目前贵州省以产业发展为动力，促进群众脱贫致富，已经有一部分开展农业合作社，实现了农业的升级。例如安顺龙井村自 2016 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来，得到青岛对口帮扶，投入资金 120 万元发展香菇种植产业。建有大棚 73 个（青岛帮扶），并由村支两委牵头成立村级合作社，合作社投入 25.2 万元购置食用菌 14 万个，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搬迁户参与食用菌种植。大龙经济开发区除了一心村辣椒基地外，新筹备的山泉水厂已经进入检验阶段，养鸡场也在筹建当中。但是这种转型农业仍然是少数，这是需要我们直面的客观事实。

因此政府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和市场的特色，因地制

宜，避免生搬硬套，确保特色农业实现升级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二是政府应当鼓励搬迁农户流转自己手中的旱地、山林、水田，加入农业合作社，进行经济作物种植，获得股利分红，实现特色农业升级转型。三是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土地、弃土场发展农业产业，推广“农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搬迁户”模式，建立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

6.3 建立金融服务机制，拓宽增收渠道

金融资本又是生计资本中比较显著的促进因素，因此加大对农户的扶贫力度，提高农户的金融资本拥有量，对于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以及生计可持续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贵州省制定了许多配套的金融扶贫政策。例如大龙开发区将安置区门面、农贸市场以低价租赁给搬迁户经营，创办就业扶贫车间，开发扶贫专岗、公益性岗位等，专门用于安置易搬群众就业，增加农户与搬迁安置相关的收入。

因此，为了能够让贵州省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得以有效的推进，应该建立金融服务机制。一是尽可能的为搬迁农户提供大量的就业、创业机会，让搬迁农户不用外出务工就可以实现稳定就业；二是政府可以制定“金融扶贫+搬迁户”模式，加强扶贫贷款和再贷款的金融支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资金参与移民安置区后续产业的发展；三是政府可对建档立卡搬迁农户实行3年内免息贷款，鼓励搬迁农户积极参与“特惠贷”、“三变”改革等，扩大收入来源，增强脱贫能力；四是探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房屋产权等抵押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向搬迁户提供贷款，从根本上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6.4 加大帮扶力度，确保项目落地

搬迁农户融入安置地绝不是简单的非农化问题，目前贵州省已经围绕搬迁农户社会身份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建立了与此相对应的扶持政策和体制机制。医疗、教育、社区服务基础建设等帮扶措施是保障搬迁农户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加大帮扶力度，可以推动搬迁群众在城镇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公平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因此政府应当聚焦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社区服务等配套基础建设，加大政府帮扶力度，让搬迁农户真正“搬得出、融得下”。一是政府应准确把握搬迁子女的就学需求和安置地事物教育资源供给情况，提前做好搬迁子女的就学工作，

安置点可以同步配套建设幼儿园、小学、初中等以满足搬迁子女的就学需求；二是政府应在安置点周围合理配套建设医疗机构，配备标准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同时制定特殊的医疗优惠政策，解决搬迁农户“看不起病”的问题；三是每个安置点应当设立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就医、就学、就业等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应当设立文体活动中心，打造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乡愁馆等，满足搬迁农户的文体休闲娱乐需求，增强幸福感。四是政府还可以根据搬迁户的基本情况，因户施政，实行结对帮扶。重点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关注搬迁户的现实困难，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在增收上进行指导，了解帮扶搬迁户的就业意愿来帮扶其就近就业，实现搬迁家庭的稳定增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积极宣传结对帮扶的各项政策，例如医保、养老保险、特惠贷等。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7.1 结论

为实证分析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后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本文对贵州省 4 个典型安置点进行实地入户访谈，在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构建起一个适合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分析框架。基于该分析框架，首先对农户的生计转型情况就行研究，研究得出，在 387 份研究对象中有 321 户实现了生计转型；其次通过构建搬迁农户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对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并做对比分析，探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差异性的原因；最后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影响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成功的因素影响程度。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生计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调研样本中有 321 人（82.9%）发生了生计转型，减少的务农农户主要转向本地务工，从事公益性岗位从无到有，从事务农农户大幅减少，本地务工农户增加，农户生计组合方式更加科学合理。

(2) 易地扶贫搬迁前后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均值分别为 78.81 和 84.54，；自然资本均值得分分别为 76.67 和 81.08；社会资本均值分别为 74.65 和 76.98；人力资本均值分别为 74.49 和 82.13；金融资本均值分别为 68.56 和 70.59，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有效提高了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搬迁后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显著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相对丰富。但搬迁前后金融资本始终是限制研究区农户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家庭收入的提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政府应该积极引导给予移民就业机会，带来更多的家庭收入。

(3) 利用二元 logistic 进行回归得出搬迁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技能培训次数、家庭年收入、与搬迁安置相关的年收入、政府帮扶是否增加，对农户生计转型是否成功有显著影响。结合实际调研的情况，安置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同时为农户提供各种技能培训，开展金融扶持降低农户的信贷难度，增加了创收渠道，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7.2 研究展望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困难，特别是城镇化集中安

置，给搬迁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带来重大改变，存在一个较长的磨合和社会适应过程。搬迁入住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目标，后续扶持和社区管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是否真正脱贫，实现生计转型成功，还需要探索的问题有很多，本文样本数量有限，不能评价整个搬迁农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需要政府、社会继续关注移民搬迁后真正搬得出去，落得下来。根据移民自身的情况实施对应的政策帮助，保障移民自身的基本权益。

致谢

三年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聆听老师的教诲和同学在一起的欢乐时光也即将远去，回首三年时光，心中最多的是感激之情，感恩母校给予的平台，感恩老师的谆谆教导，感激在研究生期间给予我无限关心帮助的同学。

首先，我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罗蓉老师和王志凌老师。犹记得师生首次会晤，罗老师温柔的笑容、亲切的话语让我原本紧张的心情迅速地放松下来。感谢罗老师的鼓励与鞭策，在我面对学习上的困难与挑战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是罗老师坚定的支持让我坚持下来，最终有所成果。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中给予我的所有帮助，从开题到中期到最终定稿，老师都细心修改，用心指导，最终成稿。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舍友朱宝霞同学，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在奋战 CPA 的道路上不那么孤单；感谢我的师弟师妹，感谢他们不辞辛苦的陪我一趟趟调研。没有华丽的辞藻，我在此仅记录下我的肺腑之言。人生中有相别时，惟愿来日江湖再见！

参考文献

- [1]王博. 诺邓古村村民生计转型研究[D]. 云南大学, 2016.
- [2]黄载德. 城中村村民生计转型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 [3]王晓毅. 易地扶贫搬迁方式的转变与创新[J]. 改革, 2016(08):71-73.
- [4]王红彦, 高春雨, 王道龙, 毕于运, 王磊, 王亚静. 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的国际经验借鉴[J]. 世界农业, 2014(08):15-21+66+195.
- [5]王金涛, 陈琪. 动员力度、心理聚合与搬迁绩效——以陇中某地易地搬迁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09):82-87.
- [6]王静, 朱琳.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39(06):165-170.
- [7]孔令英, 李媛彤, 王明月, 郑涛. 项目制扶贫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基于新疆疏勒县的调查数据[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9[2019-11-14].
- [8]叶青, 苏海.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3(05):64-70.
- [9]冯伟林, 李树苗. 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22(04):2-9.
- [10]孙永珍, 高春雨. 新时期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理论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41(36):14095-14098.
- [11]许汉石, 乐章.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33(10):100-105.
- [12]刘伟, 徐洁, 黎洁. 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J]. 资源科学, 2018,40(10):2002-2014.
- [13]刘宗华, 邬兰娅, 刘魏, 田红宇. 易地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1(03):97-101+107.
- [14]刘文佳, 陈英. “公司+农户”模式下农户生计资本变化测度——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9,13(04):97-104.
- [15]安士伟, 樊新生. 基于收入源的农户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 经济经纬, 2018,35(01):29-34.
- [16]陈胜东, 蔡静远, 廖文梅.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

- 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15(06):632-640.
- [17]李娜.滇中彝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以永仁县彝族移民为例[J].毕节学院学报,2010,28(07):15-19+25.
- [18]李宇军,张继焦.易地扶贫搬迁必须发挥受扶主体的能动性——基于贵州黔西南州的调查及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05):156-159.
- [19]李小云,董强,饶小龙,赵丽霞.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04):32-39.
- [20]李树苗,徐洁,左冬梅,曾卫红.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7,39(04):1-10+124.
- [21]吴新叶,牛晨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2):118-127.
- [22]严登才.广西岩滩库区移民贫困成因与可持续生计路径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3(02):142-147.
- [23]何力.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失地农民生计资本分析——基于贵州都匀的调查[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08):440-443.
- [24]苏冰涛,李松柏.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秦巴山区“生态贫民”生计范式转变研究[J].农村经济,2014(01):96-99.
- [25]张芳芳,赵雪雁.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15,35(10):3157-3164.
- [26]张银银,马志雄,丁士军.失地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06):42-51.
- [27]周建新,于玉慧.橡胶种植与哈尼族生计转型探析——以西双版纳老坝荷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02):50-55.
- [28]赵雪雁,张丽,江进德,侯成成.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03):531-542.
- [29]赵立娟,康晓虹,史俊宏.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08):158-162.
- [30]赵旭,肖佳奇,段跃芳.外迁安置、土地流转及水库移民生计转型[J].资源科

- 学, 2018,40(10):1954-1965.
- [31]高强. 重视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发展问题[J]. 开放导报, 2019(04):24-29.
- [32]夏紫顿.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研究 [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 2019(03):58-59.
- [33]梁爽, 吴文恒, 强彦红, 鲁大铭. 西北地区小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40(07):74-80.
- [34]葛根高娃, 乌云巴图. 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的概念、问题与对策[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3(02):118-122.
- [35]曾小溪, 汪三贵. 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9(02):60-66+91.
- [36]韩文文, 刘小鹏, 裴银宝, 安琼, 李永红. 不同地貌背景下民族村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J]. 应用生态学报, 2016,27(04):1229-1240.
- [37]李婵. 基于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研究[C]. 四川劳动保障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劳动保障研究会议论文集(二). 四川劳动保障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四川劳动保障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2019:11-13.
- [38]Ellis.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 [39]Sen A. Famines and poverty[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 [40]Agnes Quisumbing, Scott McNiven.Moving forward, looking back:the impact of migrat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 the rural Philippines[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46(1):91-113.
- [41]Audrey N Maretzki. Women's NutriBusiness cooperatives in Kenya:an integrated strategy for sustaining rural livelihoods[J].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2007,39(6):327-334.
- [42]Bo R Doos, 高速进. 预测环境性移民[J]. 世界环境, 1997(04):44-48.
- [43]Brian King.Spatialising livelihoods:resource access and livelihood spaces in South Africa[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11,36(2):297-313.
- [44]David J. Wrathall. Labor migration amidst ecological change[J].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6,5(2).
- [45]Gin Koczberski,George N Curry. Making a living:land pressures and changing livelihood strategies among oil palm settlers in Paoua New Guinea[J]. Agricultural

- Systems,(2005),85(3):324-339.
- [46]Hesslberg Jan,Joseph Y. An assessment of the exten and causes of food insecurity in northern Ghana using alivelhood vulnerability framework[J].
GeoJournal,2006,67(1):41-55.
- [47]Ian Wallace.A framework for revitalis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in sub-Saharan Africa:strengthening the human resource base for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iopment,2007, 27(5):581-590.
- [48]Marisa C Goulden,W Neil Adger,Edward H Allison,et al.Limits to resilience form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lak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3,103(4):906-924.
- [49]Peter Jacobs.Understanding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West Coast District, South Afric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2012,29(4).
- [50]Westma.How much are natures services worth[J].Science,1997,197:960.
- [51]Alisson F.Barbieri,“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Brazil’s Northeast:scenariosfor2025-2050”,PopulationandEnvironment,no.31,(2010),pp.344-370.
- [52]Bruce C Glavovic, Saskia Boonzaie.Confronting coastal poverty:building sustainable coastal livelihoods in South Africa[J].Ocean &Coastal Management,2007, 50(1/2):1-23.
- [53]Diane C. Bates, “Environmental Refugees?Classifying Human Migration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vol.23,no.5,(2002),pp.465-477.
- [54]Daily G C, et al. Nature 's Service: Societal Depend ence on Natu ral Ecos ystems.
Washing ton D C: Island Press, 1997.
- [55]E. El-Hinnawi, “Environment Refugee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Nairobi,No.4, (1985).
- [56]Ian Scoones.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R]. IDS Working Paper 72. Brighton: IDS,1998.
- [57]Ralph Chami,Connel Fullenkamp,Samir Jahjah. Areimmigrant remittance flows a source of capital for development[R].Washington D C: IMF Working Paper 03/189,2003.

[58]Sabine Henry,“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Migratory Pathways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Typologies,”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no.25,(

附录 1

发表论文：

[1]罗蓉, 韩琳子, 杜苗苗. 互联网+背景下电商发展模式探究——基于贵州省特色农产品[J]. 电子商务, 2020(02):27-28.

附录 2: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转型研究”调查问卷

序号: _____ 安置点: _____

一、农户搬迁基本情况

1、您的姓名_____；您的年龄是：_____岁；您的性别_____；家庭总人口_____人。

2、您的文化程度是()

(1) 小学以下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大专/大学及以上

3、搬迁前您家的劳动力数量()；搬迁后您家的劳动力数量()

4、您的健康状况？(1)良好 (2)偶有小病 (3)慢性病(请注明_____)

5、您家的搬迁入住时间是_____年

(1) 2015 年及以前 (2) 2016 (3) 2017 (4) 2018 (5) 2019

6、您家安置地点属于()

(1) 市州 (2) 园区 (3) 县城 乡镇 园区 (4) 中心村 (5) 其他

7、搬迁居住地点:_____ 搬迁后您距离原居住地_____公里。

8、您家搬迁前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 (1) 是 (2) 否

9、搬迁前您家是否有人参加过技能培训？(1) 是(参加过_____次) (2) 否

10、搬迁后您家是否有人参加过技能培训？(1) 是(参加过_____次) (2) 否

二、搬迁前后自然资本变化情况

11、您家移民搬迁前土地的总量是：

(1) 耕地_____亩 (2) 山林约_____亩 (3) 水田约_____亩

12、搬迁前您家原有的耕地以及林地如何处置？() 搬迁后？()

(1) 继续使用 (2) 荒废闲置 (3) 已流转 (4) 退耕还林 (5) 收归集体

13、若您家土地进行了流转，您家流转的土地数量：

(1) 耕地_____亩 (2) 山林约_____亩 (3) 水田约_____亩；每年获得土地流转资金约为()。

14、您认为您家的土地质量好吗？(1) 好 (2) 一般 (3) 差

三、搬迁前后物质资本变化情况

15、您家搬迁前住房面积约_____平方米；您家搬迁后住房面积约_____平方米。

16、您家搬迁前住房结构为()；搬迁后住房结构为()。

(1) 土木 (2) 砖木 (3) 砖混 (4) 钢混

17、您家搬迁前拥有哪些交通工具? ()

(1) 电动车 (2) 摩托车 (3) 小轿车 (4) 卡车

18、您家搬迁后现在拥有哪些交通工具? ()

(1) 电动车 (2) 摩托车 (3) 小轿车 (4) 卡车

四、搬迁前后金融资本变化情况

19、搬迁前,您家是否有存款? (1) 有,约_____万元 (2) 没有
搬迁后,您家是否有存款? (1) 有,约_____万元 (2) 没有

20、搬迁前,您家是否有负债? (1) 有,约_____万元 (2) 没有
搬迁后,您家是否有负债? (1) 有,约_____万元 (2) 没有

21、搬迁前,您家是否申请过金融机构贷款? ()

(1) 否 (2) 申请但没贷到 (3) 申请贷到了

22、搬迁后,您家是否申请过金融机构贷款? ()

(1) 否 (2) 申请但没贷到 (3) 申请贷到了

23、搬迁前,您家的家庭年收入_____元;搬迁后,您家的家庭年收入_____元。

24、搬迁后,您家取得的政府安置就业岗位_____,年收入_____元

25、搬迁后,您家用于生活开支的费用相对于搬迁前()

(1) 增加一倍以上 (2) 有所增加 (3) 差不多 (4) 变少

主要增加的支出是_____方面,大约_____元

五、搬迁前后社会资本变化情况

26、搬迁前,您家遇到困难时找谁帮忙最多? () 搬迁后? ()

(1) 亲戚 (2) 朋友 (3) 邻居 (4) 干部或组织

27、您家亲戚朋友中有无村干部或国家公务员? (1) 有(____人) (2) 没有

28、搬迁后,您家用于人情往来的礼金费用相对于搬迁前()

(1) 变多 (2) 差不多 (3) 变少

29、搬迁后,您家用受到的政府帮扶相对于搬迁前()

(1) 变多 (2) 差不多 (3) 变少

六、搬迁前后生计方式变化情况

30、您家搬迁前如何维持生计?

(1) 务农_____ (2) 务工_____ (3) 经商_____ (4) 其他(请注明_____)

31、您家搬迁后如何维持生计?

(1) 务农_____ (2) 务工_____ (3) 经商_____ (4)(请注明_____)

附：贵州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声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在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完成的学位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知识产权归属贵州大学。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韩琳子 日期：2020年6月12日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贵州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贵州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保 密（），在____年解密后适用授权。

不保密（）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论文作者签名：韩琳子 导师签名：罗茗

日期：2020年6月12日